

唐人以來《蘭亭》接受觀念流變研究

——兼論「蘭亭論辨」產生的觀念史根源

劉 磊^{*}

摘 要

「定武本」《蘭亭序》在宋代成為《蘭亭序》諸版本中最為經典和最為重要的一個，並非由其自身的書法成就確實超越其他《蘭亭》版本所致，而是在宋代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思維方式下被逐漸固定下來的，加之元代趙孟頫對之的進一步推崇和觀念構建，遂逐漸成為《蘭亭序》版本當中的主流，並一直影響到清代乾隆年間的汪中對於其自藏「定武本」《蘭亭序》的觀念構建。當這一觀念構建未被「打破」之前，人們對於「定武本」《蘭亭序》的態度呈現出基本穩定的態勢，但一旦在社會觀念發生重大的變化時，那麼人們對於「定武本」《蘭亭序》的態度便很難不發生新的變化，這就是後來阮元、李文田乃至郭沫若等人對《蘭亭序》提出質疑的思想根源。

關鍵詞：《蘭亭序》、觀念、流變、「蘭亭論辨」、汪中

^{*} 作者現為紹興文理學院藝術學院講師。

The Evolution of Lanting's Ideas since Tang Dynasty:

Also on the Origin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Produced
by “Lanting Argument”

Lei Liu^{*}

Abstact

“Dingwu version” became the most classic and important version of the “Lanting Preface” in the Song Dynasty. However, its importance arose more from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thinking patterns of the Song Dynasty formed over time than its achievements in calligraphy over other “Lanting” editions. In addition, in the Yuan Dynasty, Zhao Mengfu’s further respect and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for “Dingwu version” made it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stream among the versions, whose influences continued that can be seen on Wang Zhong’s understandings of “Dingwu version” collected by himself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Before this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was broken, popular attitude towards and perspective on “Dingwu version” remained stable and unchanged.

* Lecturer, School of Art, Shaoxing University

Nevertheless, once there was a major change in social concepts, people's attitude toward "Dingwu version" changed accordingly. Afterward, this change became the ideological root for questioning "Lanting Preface" by Ruan Yuan, Li Wentian and others.

Keywords: Lanting Preface, concept, change, Lanting argument, Wang Zhong

唐人以來《蘭亭》接受觀念流變研究

——兼論「蘭亭論辨」產生的觀念史根源

劉 磊

一、前言

1965年6月，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1892-1978）在《光明日報》和《文物》上發表一篇題為〈從王謝墓誌的出土談到《蘭亭序》的真偽〉的文章，指出《蘭亭序》出於後人偽托而非王羲之原作。此論一出，即引起高二適（1903-1977）、章士釗（1881-1973）等人的回應，即在現當代書法史上著名的「蘭亭論辨」。到了1973年即王羲之「蘭亭雅集」之後的第27個「癸丑年」，當日本、香港和臺灣地區開展專題紀念活動時，中國大陸卻在「文革」的背景下編輯《蘭亭論辨》一書，將郭沫若等支持《蘭亭序》為偽作的學者歸於「唯物主義」，高二適等支持《蘭亭序》係王羲之作品的學者歸為「唯心主義」，「蘭亭論辨」關於《蘭亭序》真偽問題的爭論便成為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這兩大「思想陣營」之間的「鬥爭」。雖然今天的人們不再以這樣的意識形態方式來理解那場曾經的既「政治」又「學術」的討論，但「蘭亭論辨」作為20世紀後半葉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在經過五十多年的討論之後，關於《蘭亭序》之真偽問題卻變得越來越模糊，已然成為了一個無法解決的學術難題。

王羲之(303-361)《蘭亭序》作為一件書法作品，其身世固然是撲朔迷離，但是自唐宋以來人們對之的臨摹傳拓、評議追思已然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即人們對於《蘭亭序》的「毀譽」與其所處時代思潮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一聯繫即是時代觀念的沉澱與呈現。正如金觀濤教授和劉青峰教授所言：「一旦觀念實現社會化，就可以和社會行動聯繫起來……任何社會行動都涉及普遍目的的合成，需要眾人進行價值和手段的溝通，沒有普遍觀念，由個人的行動組織成社會行動是不可思議的」。¹因此《蘭亭序》在後世流傳過程當中所受到的種種「毀譽」意見，亦均可視之為某種社會觀念對之的「觀念構建」所致。因此，儘管《蘭亭序》本身書法成就很高，可是一旦離開歷代書家和學者對之的評價和討論，那麼古人語境中的《蘭亭序》與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蘭亭序》勢必會有所不同；而那些歷代書家和學者的評價，正源自於他們各自所屬時代思潮背景，同時也只有在其所屬時代思潮背景下，才能夠理解他們對於《蘭亭序》的種種思考和討論，因為那些評價本身正是某種時代思潮在《蘭亭序》相關問題上的呈現。

《蘭亭序》真跡業已失傳，宋代以來《蘭亭序》的各類版本又極多而複雜，這就為後來有關《蘭亭序》的種種疑問（如版本優劣、文獻記錄與帖文不合、翻刻過程以訛傳訛等等）埋下伏筆。今天所能見到的《蘭亭序》傳世版本，主要可分為「唐摹本」和「定武本」兩類，²相傳在《蘭亭序》為唐太宗(598-649)收藏之後，曾命搨書人「摹搨」以賜王公，遂被後人稱為「唐摹本」，現藏北京故宮博物

¹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頁3。

² 這樣的「二分法」首見於元末明初的王禕：「《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為『唐臨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若『玉枕本』，則河南始縮為小體，或謂率更亦嘗為之。」見王禕著，顏慶餘點校：《王禕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卷17〈跋玉枕蘭亭帖〉，頁484。

館的「天曆本」、「褚臨本」以及「神龍本」即被認為是此類「唐摹本」（分見圖1、圖2、圖3）；而「定武本」《蘭亭序》則傳為唐太宗以歐陽詢（557-641）臨寫本（亦有文獻稱為摹本）上石，宋人李之儀（1048-1117）見「其位置近類歐陽詢」，遂懷疑為歐陽詢所書。³「定武本」《蘭亭序》在宋代以來流傳極廣，在士大夫階層影響也非常大，以至於翻刻本亦層出不窮，今天學界認定的較為可靠的原石拓本僅有「孤獨僧本」和「柯九思本」兩種（分見圖4、圖5），其餘均為原拓的翻刻本或重刻本，此外還有許多「定武本」《蘭亭序》的臨寫本傳世，較為著名的有趙孟頫（1254-1322）（見圖6）、俞和（1307-1382）、文徵明（1470-1559）、陳獻章（1428-1500）、王鐸（1592-1652）、馮銓（1596-1672）、翁方綱（1733-1818）等人臨本或寫本。在學者水賚佑看來，「唐宋期間，《蘭亭》的臨摹墨蹟是不不少的；但宋以後，《蘭亭》流傳最多的是石刻本系統，而石刻系統中最早、最逼真，影響最深、最廣的就是定武本，它甚至被推為《蘭亭》的偶像」，⁴因此可以說，梳理和研究歷史文獻中有關「定武本」《蘭亭序》的評價和討論，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宋代以來人們對於《蘭亭序》及其書法的基本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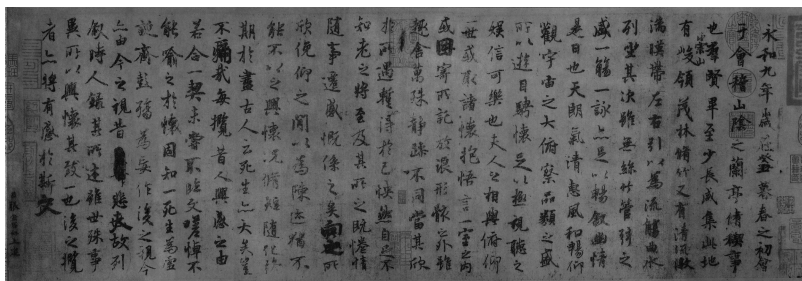


圖1：「天曆本」《蘭亭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蘭亭八柱第一」）⁵

³ 李之儀：《姑溪題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1，頁75。

⁴ 水賚佑：〈宋代《蘭亭序》之研究〉，收於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78。

⁵ 「天曆本」《蘭亭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蘭亭八柱第一」），北京：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網址：<https://en.dpm.org.cn/dyx.html?pa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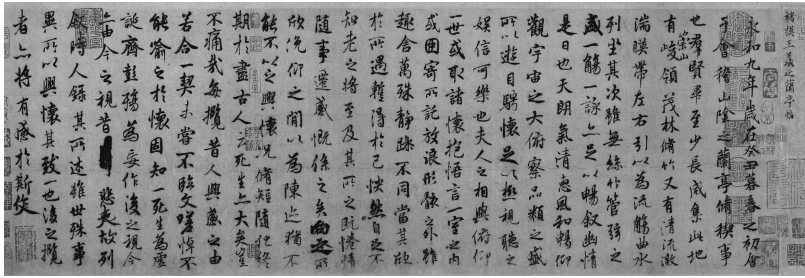


圖 2：「褚臨本」《蘭亭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蘭亭八柱第二」）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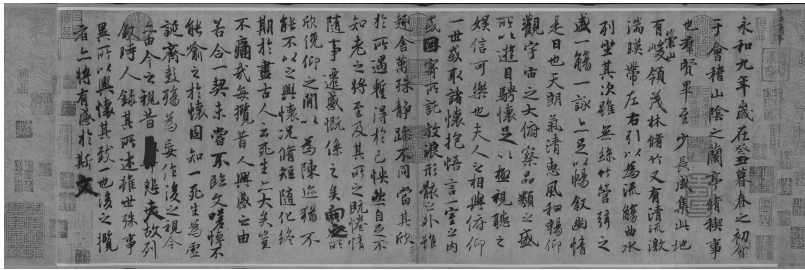


圖 3：「神龍本」《蘭亭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蘭亭八柱第三」）⁷

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10/3747/img0003.xml，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⁶ 「臨本」《蘭亭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蘭亭八柱第二」），北京：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網址：<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s?id=71058>，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⁷ 「神龍本」《蘭亭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蘭亭八柱第三」），北京：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網址：<https://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08/1628/img0010.xml>，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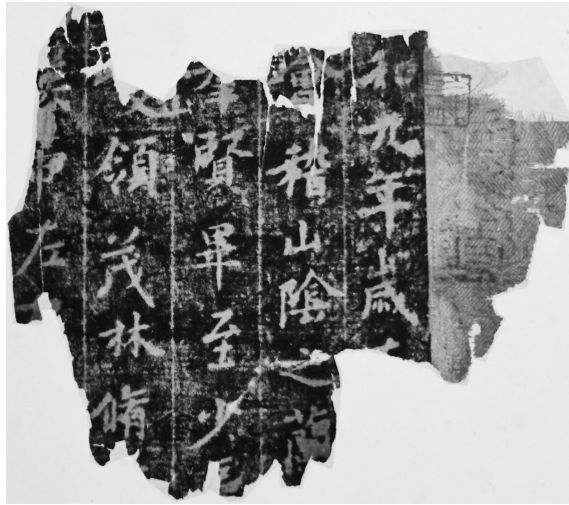


圖4：定武「獨孤僧」本《蘭亭序》（東京：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⁸



圖5：定武「柯九思」本《蘭亭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⁹

⁸ 定武「獨孤僧」本《蘭亭序》（東京：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網址：<https://webarchives.tnm.jp/imgsearch/show/C0066716>，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⁹ 定武「柯九思」本《蘭亭序》（《定武蘭亭真本》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典藏資料檢索系統，網址：<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Painting/Content?pid=14853&Dept=P>，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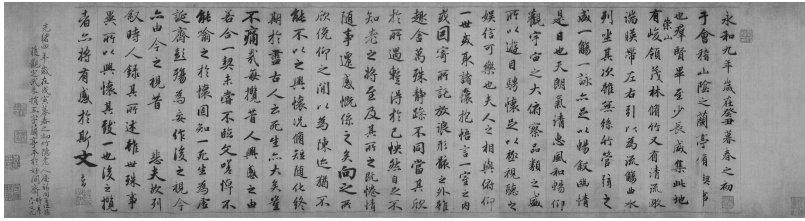


圖 6：趙孟頫臨《蘭亭序》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¹⁰

二、學界研究現狀之檢討及研究中所遇到的困難

學者方波曾以宋元時期的「崇王（羲之）」觀念為題，以觀念史研究為視角深入討論了書學與其時代思潮的關係，即「探討十一至十七世紀『崇王』觀念的流變，實際上是在探討隱藏於『崇王』觀念內的、通過『崇王』觀念所表現出來的書法觀念的流變和社會生活的變遷」；¹¹ 在其另外一部從社會文化學角度對於王羲之及其書法接受史的研究中，他又將這一研究由「宋元明」推至清代，認為「以王羲之為核心的一線單傳觀念的嬗變和碑學的興起、北朝石刻的經典化，改變了書法的經典體系，擴展了取法對象，也改變了千百年來一直穩定的書法生態環境、發展態勢」，¹² 並指出：「出土材料的增多和人們見識的增廣、觀念的轉變，加上某些特殊目的如為碑學爭正統的需要，部分書家以東晉時期的石刻資料來質疑王羲之書跡為偽造，雖然這些質疑，只是少數書家的觀點，並未得到其時書家和學者的廣泛回應，但在王羲之書法接受史中仍可稱得上是石破天

¹⁰ 趙孟頫臨《蘭亭序》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網址：<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s?id=70961>，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¹¹ 方波：《宋元明時期「崇王」觀念研究》（海口：南方出版社，2009年），頁14。

¹² 方波：《詮釋與重塑——基於社會文化學的王羲之及其書法接受史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6年），頁194。

驚」。¹³ 從總體而言，方波對於《蘭亭序》在宋元明清四朝直至今天的歷史長程所處的地位及產生的影響和諸問題的研究是卓有成效和具有積極意義的。

但是有關《蘭亭序》的真偽問題，在經歷了「蘭亭論辨」五十餘年的討論之後，卻成為學界難以正面回答的一個難題。學者白銳明確指出：「面對汗牛充棟的《蘭亭序》論述，必須選取新的視角，才會不落窠臼」，¹⁴ 而其所謂「新的視角」，即是將《蘭亭序》真偽問題暫時懸置，而從西方接受美學、書學風格史以及唐宋政治史、文化史、文學史的角度來討論唐宋《蘭亭序》的「接受問題」，為學界「詳細梳理唐宋時期讀者接受《蘭亭序》的發展脈絡和整體風貌」。¹⁵ 在她看來，這樣的研究思路不失為一條有效的研究《蘭亭序》的途徑，因為這樣既可以「巧妙地」避開幾十年來由「蘭亭論辨」所引起的關於《蘭亭序》真偽問題的大討論，又可以《蘭亭序》的「讀者」為中心，從受眾接受的角度來審視《蘭亭序》在歷史流傳過程中與書法史以及社會觀念之間的互動，可謂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視角」。¹⁶ 眾所周知，宋代以後關於《蘭亭序》的相關文獻記錄才開始比較豐富，而宋前文獻相較而言少且孤立，白氏的這本著作對於補充唐代《蘭亭序》的接受問題和有關史料是有相當的意義的。客觀地講，白銳明確地意識到「蘭亭論辨」對於《蘭亭序》的真偽質疑至今仍然未得到解決，而在「真跡不在」、「議論紛紛」的研究現狀下，與其參與到無休止的討論之中，不如從中跳脫出來，從歷史接受的視角來梳理和研究《蘭亭序》來得更為妥貼與合適，畢竟《蘭亭序》在一千多年的流傳過程中，「其接受事實已然存在，毋庸置

¹³ 方波：《詮釋與重塑——基於社會文化學的王羲之及其書法接受史研究》，頁194。

¹⁴ 白銳：《唐宋《蘭亭序》接受問題研究》（海口：南方出版社，2009年），頁191。

¹⁵ 白銳：《唐宋《蘭亭序》接受問題研究》，頁6。

¹⁶ 白銳：《唐宋《蘭亭序》接受問題研究》，頁191。

疑」。¹⁷ 應該說，白銳的這一觀點並非偶然和個別的意見，而是代表著當下《蘭亭》研究的某種「共見」：《蘭亭論辨》關於《蘭亭序》真偽問題的討論已經將相關史料所用殆盡，惟有寄希望於「新史料」（特別是出土文物或文獻）的發現，才有對之展開進一步討論的可能。¹⁸

可問題的關鍵在於，不僅在宋代以來的文獻中有昭陵被盜發而導致鍾、王等魏晉書法重現人間的記載，¹⁹ 更有《蘭亭序》真跡重現的記錄。²⁰ 如此一來，希望通過對昭陵或乾陵的考古發掘而獲得《蘭亭序》真跡的可能性便大大降低；何況即使對昭陵（或乾陵）進行考古發掘並找到那件曾入唐皇室的《蘭亭序》，也無法確認其是否為王羲之原作，因為《蘭亭序》在唐前文獻的記載中是不清楚的，很難講為唐皇室收藏的那件「最初的」《蘭亭序》便是王羲之的真跡無疑。因此，儘管在理論上講可以依靠出土文獻來證明《蘭亭序》的真偽問題，但其實未必如學人們所想像得那麼順利，因為「蘭亭論辨」對

¹⁷ 白銳：《唐宋《蘭亭序》接受問題研究》，頁191。

¹⁸ 學者陳忠康也執有類似的觀點，他說：「有關《蘭亭序》的學術研究，在沒有新的材料發現之前，《蘭亭》的真偽問題可暫時懸置，與其膠著於真偽問題而最終仍歸於莫衷一是，還不如探討一下一千多年來由它的影響所覆蓋的那一部分書法史。」見陳忠康：《經典的複製與傳播——以《蘭亭序》版本為中心的考察》（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頁5。

¹⁹ 歐陽脩：「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見歐陽脩：《集古錄跋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卷4〈晉蘭亭修楔序（永和九年集本）〉，頁187。

²⁰ 桑世昌《蘭亭考》卷3轉引張舜民《畫墁錄》言：「貞觀末，太宗一日附語高宗：『吾欲就爾求一物，可乎？』高宗跣足俯伏，從之對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國家天下，陛下所賜。此外更欲問臣求何物？』太宗曰：『吾千秋萬歲後，欲將《蘭亭》，如何？』高宗再拜哽噎而已。至昭陵作治，以玉匣內之玄堂。其後昭陵累經開發，《蘭亭》復出人間。元豐末，有人自兩浙與織女支機石同齎入京師。至太康縣，值裕陵奉諱，不獲上之，質錢於民間而去，今不復聞存沒。王欽若云：『支機石予嘗見，其圓可方二寸，不圓，微宛，正碧，天漢左界，北斗經其上。太宗在唐，不世主也。一書之微，生以計取，死以愛求。生猶可玩適，死將何為哉？與夫富民多藏厚葬者無以異也。』（張舜民《畫墁錄》）。參見桑世昌、俞松：《蘭亭考 蘭亭續考》（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年），頁41。

於《蘭亭序》真偽問題的質疑，雖然在表面上是對《蘭亭序》的真偽問題的討論，但其實是有著深刻的思想淵源和觀念思潮，不從汪中（1744-1794）、李文田（1834-1894）、郭沫若、高二適等人的討論中梳理研究線索，而僅僅寄希望於出土文物的發現，顯然還是不能回答李文田、郭沫若等人對於《蘭亭序》的質疑。

在以往幾十年的討論中，相關的有價值的史料和研究線索固然被較為充分的討論，但是當筆者對幾十年來辯論雙方以及後來參與討論的專家們所發表的論文做整體把握時，還是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視角：對於已有史料的再挖掘可能要比期待一個幾乎不可能得到的《蘭亭序》真跡來得更為可靠——在以往的討論中，人們雖然會反復提及李文田的那篇質疑《蘭亭序》的題跋，但往往是孤立地看待這篇題跋而未將其置於歷史觀念變遷的長河中加以考查，如李文田為何而寫、李文田為什麼要這樣行文、他質疑《蘭亭序》的目的何在等基本問題。學人們對於上述問題往往不予關注，而是受李文田和郭沫若行文的「誘導」，進而考證所謂《蘭亭序》是否應當存有「隸書筆意」、《蘭亭序》與《臨河序》孰優孰劣等難以定論的問題，可謂「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了。

有鑒於此，筆者嘗試「跳出」五十餘年來「蘭亭論辨」的近乎「公婆各有理」的討論，從思想史上觀念流變的角度重新審視「蘭亭論辨」之所以產生的原因所在。郭沫若對《蘭亭序》提出質疑時，除了引用當時新出土的王謝墓誌外，還特別引證了一段晚清學人李文田對《蘭亭序》提出質疑的跋文作為理論依據，而這段題跋，便題寫在「汪中舊藏《定武蘭亭》」²¹中。「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在「蘭亭論辨」開始以後直到今天的五十餘年裡，儘管其與「蘭亭論辨」的諸

²¹ 李文田的題跋，見汪中舊藏：《真定武蘭亭序》（上海：文明書局，1924年），頁21-22。另，郭沫若在〈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中寫道：「事實上《蘭亭序》這篇文章根本就是依托的！這到清朝末年的光緒十五年（1889）才被廣東順德人李文田點破了。」見郭沫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文物》1965年第6期，頁7。

多問題和疑點緊密相關，但它卻從未被專題研究過，也未見到有學者將其置於「蘭亭論辨」的語境下加以討論。雖然「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其本身的研究價值並不高，但對於討論「蘭亭論辨」而言，卻有著特殊的研究價值：正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為李文田提出對《蘭亭序》的質疑提供了基本語境，那麼要釐清李文田為什麼提出「蘭亭三疑」，便必須回到這一基本語境而後可；李文田的「蘭亭三疑」又為郭沫若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因此要討論「蘭亭論辨」，也應當從「蘭亭三疑」和載有「蘭亭三疑」的這件「汪中舊藏《定武蘭亭》」開始。甚至可以說，「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對於研究「蘭亭論辨」具備著獨特的價值：將「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置於「蘭亭論辨」的背景之下予以討論，則可以看到「蘭亭論辨」的全過程均未能脫離「觀念」對之的「塑造」，無論是汪中或李文田，他們對於《蘭亭序》的或毀或譽其實都與其自身學術主張以及時代思潮有著緊密的關聯。未對這些問題進行基本的考察之前，是無法看到「蘭亭論辨」之關鍵所在的。因此，本文將重點呈現對汪中、李文田曾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思潮與《蘭亭》觀念，進而從觀念史的角度來理解和把握「蘭亭論辨」這一歷史和文化現象。

三、汪中對《蘭亭序》敘事與意向的觀念來源

在中國書法史的發展過程中，可以說沒有任何一件書法作品可以和《蘭亭序》相媲美：《蘭亭序》在歷史上曾經享有「天下法書第一」²²、「古今絕冠」²³、「無上正覺」²⁴等諸多美譽，更為有趣的是，這些

²² 此說法係出於《蘭亭考》卷6。詳見桑世昌、俞松：《蘭亭考 蘭亭續考》，頁29-31。

²³ 此說法係出於趙孟頫：〈跋定武《蘭亭序》趙子固落水本〉。收於啟功藏：《清乾隆內府摹刻落水蘭亭並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9-31。

²⁴ 此說法係出於鮑俊：〈跋定武《蘭亭序》韓珠船本〉，收於韓珠船舊藏：

美譽是在《蘭亭序》真跡不在、各種傳說撲朔迷離的情況下所獲得的；同時，雖然《蘭亭序》真跡不在，但由於後人對之的摹搨，並在宋代以後皇室和士大夫階層的推崇下形成了蔚為壯觀的《蘭亭序》收藏、鑒賞、臨寫、翻刻等活動，這更是其他歷代書法名跡所無法比擬的。在《蘭亭序》的流傳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唐摹本」和「定武本」這兩大《蘭亭序》的版本系統，而本文的「論主」——「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即是「定武本」系統中的一件（見圖7）。

汪中在乾隆五十年（1785）曾收藏到一件「定武本」《蘭亭序》拓本，按他自己的介紹，此本「裝潢潦草，紙墨如新，無印章款識」，於是汪中便認定此本即是出自唐人歐陽詢依王羲之《蘭亭序》原跡鈎摹上石之本，於是為之撰寫了一篇近兩千字的跋文，並稱贊之：「今體隸書以右軍為第一，右軍書以《修稷敘》為第一，《修稷敘》以定武本為第一，世所存定武本，以此為第一，在於四累之上，故天下古今無二。」（見圖8）初看起來，汪氏對於《蘭亭序》的稱贊並沒有什麼特別，甚至可以視為其「狂放」個性的某種表達，但是一旦將汪中的「四累」說放置在宋代以來人們對於《蘭亭序》（特別是指向「定武本」時）的種種贊譽時就可發現，汪氏的觀點並非「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而是明顯延續了自黃庭堅（1045-1105）開始對於「定武本」《蘭亭序》的稱讚，並直接源於趙孟頫題跋《蘭亭序》時對之的推崇和觀念構建（相關史料參見趙孟頫「跋落水本《蘭亭序》」以及趙孟頫「蘭亭十三跋」、陶北溟〔即陶祖光，1882-1956〕舊藏「趙孟頫蘭亭題跋」等，見圖9、圖10、圖11）。正如學者陳忠康所說：《蘭亭序》圖像系統「是經過藝術資訊損失與時風篩選過的不完整的書法圖式，是一個被後人中介過的《蘭亭序》形象」。²⁵ 因此，若要明確《蘭亭序》是如何受到汪中贊譽並引起李文田對於《蘭亭序》的整體

《唐拓定武蘭亭序》（上海：文明書局，1941年），頁16。

²⁵ 陳忠康：《經典的複製與傳播——以《蘭亭序》版本為中心的考察》，頁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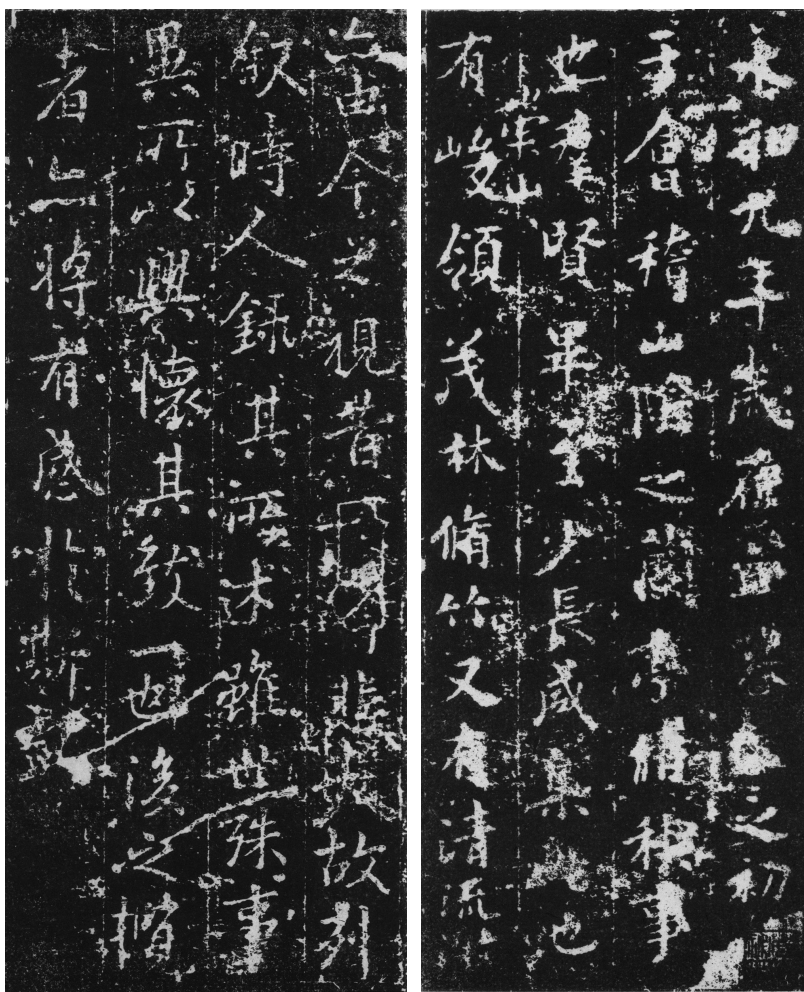


圖7：汪中舊藏《定武蘭亭》（民國十三年文明書局珂羅版）²⁶

²⁶ 汪中舊藏：《真定武蘭亭序》，頁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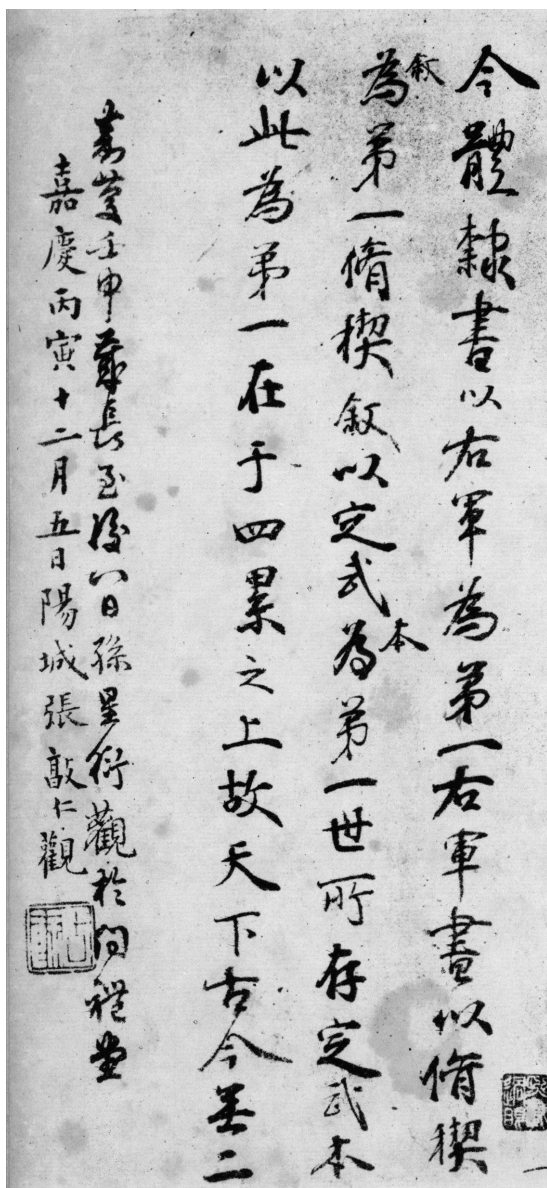


圖8：汪中書「修楔敘跋尾」首則（民國十三年文明書局珂羅版）²⁷

²⁷ 汪中書「修楔敘跋尾」，見汪中舊藏：《真定武蘭亭序》，頁8。

質疑的深層原因，就要回到觀念產生的源點——宋代（甚至宋代之前）——來回顧《蘭亭序》是如何被構建為「書聖」王羲之最為經典的書法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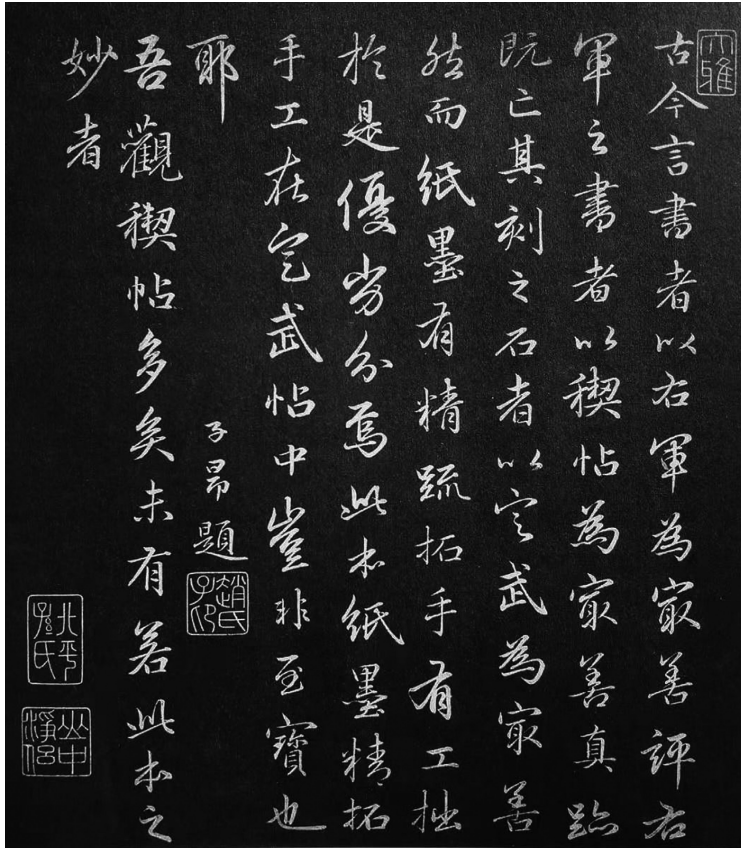


圖9：趙孟頫跋「落水本」《蘭亭序》（清內府摹本）²⁸

²⁸ 趙孟頫跋「落水本」《蘭亭序》（清內府摹本），見啓功編著：《堅淨居叢帖·珍藏輯 清乾隆內府摹刻落水蘭亭並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9-31。



圖 10：趙孟頫跋「獨孤僧本」《蘭亭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²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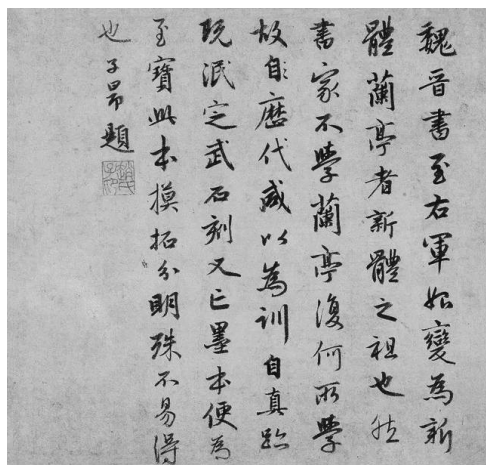


圖 11：陶北溟舊藏趙孟頫跋《蘭亭序》³⁰

²⁹ 趙孟頫跋「獨孤僧本」《蘭亭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網址：<https://webarchives.tnm.jp/imgsearch/show/C0066722>，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³⁰ 陶北溟舊藏趙孟頫跋《蘭亭序》，北京：雅昌藝術網，網址：<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71450739>，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一)「右軍」如何成為「第一」？

對於「定武本」《蘭亭序》的推崇，據目前可知的材料來看，大致起於北宋中期，其中以黃庭堅的態度最為鮮明。³¹ 但是，宋人的推崇態度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經歷了自南朝梁時開始直至唐宋的由推崇王羲之書法再到推崇《蘭亭序》再到推崇「定武本」的變化過程。³² 這一過程實際上也表明了人們對於王羲之和《蘭亭序》的認知是被不斷地構建起來的。

由於史料的缺失，今人尚無法完全清楚唐代之前《蘭亭序》的流傳情況，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蘭亭序》受到推崇首先源於

³¹ 黃庭堅對於「定武本」《蘭亭序》的肯定意見主要見於其有關題跋，如：「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彷彿存古人筆意耳。《蘭亭敘》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爾。」又：「書家得定武本，蓋彷彿古人筆意耳。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斷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彼也。」黃庭堅對於「定武本」《蘭亭序》的評價是南宋直至明清人們對於《蘭亭序》的認知和接受觀念的重要來源，從南宋尤延之與王順伯的「肥瘦之爭」，元人趙孟頫「蘭亭十三跋」中「第五跋」謂：「《蘭亭序》為右軍得意書」一句、「第六跋」云：「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一句，以及「第九跋」引黃庭堅「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一句，均可看到黃山谷對於後世的影響。黃庭堅題跋，分見黃庭堅撰，白石點校：《山谷題跋》（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卷4，頁55-56、卷7，頁110。三則趙孟頫跋語，見趙孟頫著，錢偉強、顧大朋點校：《松雪齋題跋》（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年），頁11。

³² 王羲之在東晉雖然有書名，但未被尊為「第一」。南朝宋時，羊欣贊王羲之書法為「古今莫二」，而當時人們更多地是喜歡王獻之而非王羲之。至南朝梁時由梁武帝蕭衍確定了鍾繇、王羲之、王獻之的順序，才進一步明確了王羲之書法地位高於王獻之。至唐太宗時期，王羲之被認為「兼善眾美」而超越「鍾、張」，成為了書法「第一」，同時《蘭亭序》也在《右軍書目》中排在「草書第一」。時至宋元，由於「真本」不在、「摹本少見」等諸多原因，才出現並逐漸確立了「定武本」《蘭亭序》獨尊的地位。到了元代趙孟頫時，開始將王羲之和「定武本」的「第一」並稱，為後來汪中「四累之說」的最早出處。趙氏外孫王蒙又寫「跋『十六跋本』」，將王羲之、《蘭亭序》、「定武本」、此件「定武本」（指「十六跋本」）、趙孟頫以及趙孟頫所跋本六者並贊為第一。

人們與王羲之本人及其書風的推崇。傳為羊欣（南朝劉宋時期，370-442）的《采古來能書人名》中第一次以「古今莫二」四字稱贊王羲之的書法，但此時尚未提及《蘭亭序》；南朝梁武帝蕭衍（464-549）對王羲之的書法「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的評價，亦只是對其書風整體風貌的概括，也沒有直接地與《蘭亭序》相聯繫。但是在《世說新語·企羨第十六》中，劉義慶（南朝劉宋時人，403-444）關於王羲之書《蘭亭集序》的記載可以說明羊欣、蕭衍只記王羲之而不言及《蘭亭序》的文字並不足以成為質疑《蘭亭序》晚出的證據。

（二）《蘭亭序》如何成為「第一」？

在今人之普遍觀念下，《蘭亭序》不僅是「書聖」王羲之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同時也是中國書法史上最為重要的作品，並有著「行書第一」和「天下法書第一」³³的美譽。從觀念史的角度來看，後人對於《蘭亭序》的推崇並非偶然為之，而是與歷代皇室對於《蘭亭序》以及王羲之的肯定和推崇有著直接的關係。在王羲之及其《蘭亭序》逐步登上「神壇」的過程中，有兩位皇帝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其一是南朝梁武帝蕭衍，他一反當時「崇王獻之」勝過「崇王羲之」的社會風氣，確立了以「鍾（繇）」、「張（芝）」、「大王（王羲之）」、

³³ 《蘭亭序》為「行書第一」的說法見於米芾《書史》：「《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為之，咸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真迹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見米芾：《寶章待訪錄（外五種）》（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年），頁33；「天下法書第一」出於《蘭亭考》卷6所錄米芾跋語：「右米氏秘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之流，模賜王公貴人。見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有蘇氏故題為褚遂良樞，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所書。餘字皆勾填，清潤有秀氣，轉摺毫鋌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為定。壬午閏六月，大江濟川亭蟻寶晉齋，對紫金群山，迎快風避暑九日手裝。」此跋語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米題褚摹本」（舊題「陳鑒本」）《蘭亭序》。參見桑世昌、俞松：《蘭亭考蘭亭續考》，頁88。

「小王(王獻之)」四人為核心的書法譜系，並明確將王羲之排名於王獻之之前；其二即是唐太宗李世民，《蘭亭序》唐初能夠進入內府收藏，主要是唐太宗的推動。無論《隋唐嘉話》、《法書要錄》等文獻中所記載的那場以唐太宗為主導的「賺蘭亭」故事有多少的真實成分，但《蘭亭序》入藏唐室一事與唐太宗有關，這是可以肯定的。皇帝之推崇、出身之神秘、且為「右軍得意之筆」等多種因素促使「《蘭亭序》作為王羲之生前最為珍視的作品」³⁴這一形象得以確立，並最終使《蘭亭序》成為了「第一」。在褚遂良(596-658)《右軍書目》中，《蘭亭序》第一次被列為「第一」，即「草書第一」。儘管這個「草書第一」更多地是指向排序意義上的「第一」，但是在重視儒家「禮制」和「長幼有序」觀念的唐代，排序意義上的「第一」其實也就指向了其「草書第一」的地位。但是《蘭亭序》在唐代獲得「第一」的地位，卻並不是所有王羲之書法甚至「天下法書」的「第一」，更沒有如後世趙孟頫所言「《蘭亭》者，新體之祖也」的意涵。要成為「天下法書」之「第一」，《蘭亭序》還要再次經歷時代觀念的構建。宋人對於「王羲之」、「《蘭亭序》」的理解雖各有不同，但「法書以王羲之為最善」、「王羲之書以《蘭亭序》為最善」的觀念在北宋至南宋間被逐漸固定下來，成為了此後近千年相對穩定的一個書法接受觀念。可以說，元明以後的人們對於《蘭亭序》或毀或譽，雖然各有千秋卻萬變不離其宗，即以王羲之《蘭亭序》為書法「第一」：贊譽者要肯定書學道統，就必然要肯定王羲之及其《蘭亭序》；而毀之者要否定書學道統，也必須先否定王羲之和《蘭亭序》的經典形象。這一相對穩定的蘭亭接受觀念，正是下文進一步深入研究「蘭亭論辨」的重要突破口。

³⁴ 據何延之《蘭亭始末記》載，王羲之行禊禮時興到作序，「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袂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見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頁124-125。

(三)《蘭亭序》以「定武本」為第一

由於唐代出現了《蘭亭序》為王羲之「草書第一」的說法，所以在經歷唐宋轉變之後，「定武本」《蘭亭序》作為諸多《蘭亭序》版本中最能顯現《蘭亭序》和王羲之風貌的觀念逐漸被確定下來。儘管「定武本」《蘭亭序》成為「《蘭亭序》第一」的觀念產生於北宋，但此時「定武本」《蘭亭序》亦只是諸多《蘭亭序》版本當中的一本而已，相較於「唐摹本」，「石本自應在墨蹟之下」。³⁵ 可是，正如南宋姜夔（1154-1221）所言：「《蘭亭》真跡隱，臨本行於世；臨本少，石本行於世；石本雜，定武本行於世」，³⁶「定武本」《蘭亭序》在後世被尊為「最善」，是與其流傳過程中相應的時代特徵是相合洽的：在人們尚能夠看到大量晉人墨跡及摹本的唐代到北宋中期之前，如「定武本」這樣的石刻本未必能夠得到人們足夠的重視；而近代以來，隨著攝影術和彩印技術的發展，人們熟知並臨習、取法的《蘭亭序》，依然是屬於「唐摹系統」的「神龍本」。可見，「定武本」《蘭亭序》能夠成為「獨尊」，受限於其歷史條件與時代；³⁷ 而隨著歷史的變遷，一旦發生思想史意義的大轉變時，那麼對於「定武本」《蘭亭序》的「獨尊」地位勢必會受到影響和挑戰。在此意義上而言，正是由於「定武本」《蘭亭序》享有著書學正統的「獨尊」地位，才引起了自阮元（1764-1849）以下眾人對它的懷疑和否定，並最終李文田和郭沫若不僅否定了「定武本」，而且還將《蘭亭序》文本也一併否定了。

³⁵ 說法出自樓鑰：《攻媿集》，卷3〈跋李少裴修禊序〉。參見水賚佑：《〈蘭亭序〉研究史料集》，頁36。

³⁶ 說法出自《樂善堂帖·名賢法帖第九·姜白石二》。參見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第12冊（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3年），頁230。

³⁷ 陳忠康指出：「很多南宋人都認為定武《蘭亭》一開始並不被人看重……但從歐陽脩、蔡襄的言論時間看，定武要在較之稍早時候已逐漸流播並有翻刻，只是後來更由於薛紹彭、黃山谷、蘇東坡等著名書法家的介入，定武才名聲更顯，並逐漸確立其為《蘭亭》石刻之冠的地位。」見陳忠康：《經典的複製與傳播——以《蘭亭序》版本為中心的考察》，頁48。

那麼，人們推崇「定武本」的原因何在？又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人們對於「定武本」態度的改變呢？

宋人對於《蘭亭序》的認知源於唐代，其中以《晉書》「王羲之本傳」和張彥遠(815-907)《法書要錄》卷3載何延之〈蘭亭記〉所述「蕭翼賺蘭亭事」這兩者影響最大(見圖13)。³⁸在宋人早期的記述中，「定武本」《蘭亭序》與其他的《蘭亭序》石刻本一樣，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直到黃庭堅稱贊「定武本」《蘭亭序》為「真行書之宗」、「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時，「定武本」才慢慢得到人們的重視，但黃氏也並沒有因喜「定武」而偏廢其他，還特別指出「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彼也」。³⁹同時，與黃氏幾乎同時代的米芾(1051-1107)雖將《蘭亭序》稱為「行書第一」，甚至「天下法書第一」(見圖2-12)，但其所稱讚的是唐摹墨蹟本而不是「定武石刻」，⁴⁰而且他在推崇《蘭亭序》為「行書第一」的同時，也稱讚《樂毅論》為「正書第一」，

³⁸ 劉餗《隋唐嘉話》載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由蕭翊從「越州求得之」，而此說到了宋人錢易，則變成了由歐陽詢「就越訪求得之」。見劉餗等：《隋唐嘉話 大唐新語》(北京：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31。此外，宋人李昉《太平廣記》記載唐太宗使從廣州僧處得《蘭亭》，但未言由誰得之。參見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1591。

³⁹ 黃庭堅《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卷43〈書王右軍蘭亭草後〉：「王右軍《蘭亭草》，號為最得意書，宋齊間以藏秘府，士大夫間不聞稱道者，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梁州之間焚蕩，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此書，諸儒皆推為真行之祖，所以唐太宗必欲得之。其後公私相盜，至於發塚，今遂亡之。書家得『定武本』，蓋仿佛古人筆意耳。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剗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彼也。」參見水賚佑：《〈蘭亭序〉研究史料集》，頁14。

⁴⁰ 米芾《書史》：「《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為之，咸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真跡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贊曰：熠熠客星，豈晉所得。養器泉石，留腴翰墨。戲著標談，書存焉式。鬱鬱昭陵，玉碗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真物。水月非虛，移模奪質。繡線金編，瓊機錦綽。猗歟元章，守之勿失。」見米芾：《寶章待訪錄(外五種)》(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年)，頁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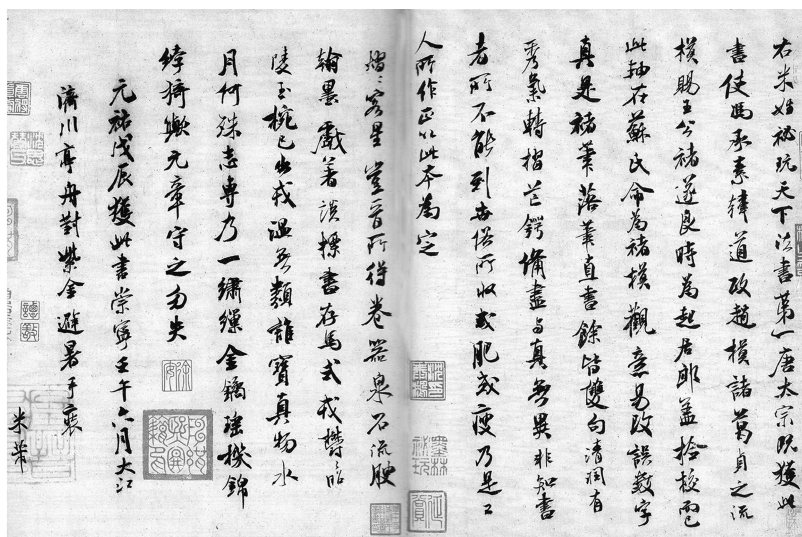


圖 12：米芾題《蘭亭序》卷

(元陸繼善摹本，舊題陳鑑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⁴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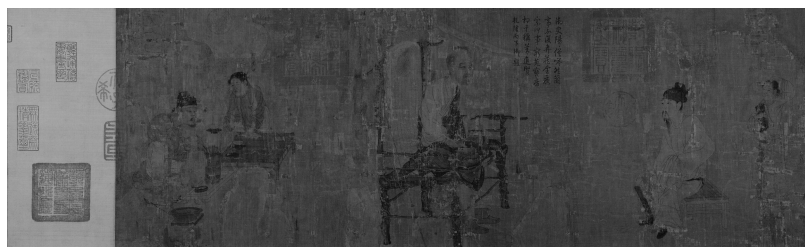


圖 13：《蕭翼賺蘭亭圖》(瀋陽：遼寧省博物館藏)⁴²

可見米芾雖然承認《蘭亭序》為「行書第一」但尚未提出「王書第一」，與汪中所稱「右軍書以《修稷敘》為第一」的說法尚不可同

⁴¹ 宋米芾題《蘭亭序》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網址：<https://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10/3749/img0002.xml>，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⁴² 《蕭翼賺蘭亭圖》，見吳炎亮主編：《又見大唐》(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2019年)，頁203-224。

日而語。此外米芾在「唐摹本」和「定武本」之間更傾向於「唐摹本」，而將「定武本」與其他「近代偽刻」歸為一類。⁴³ 正如學者陳一梅指出：宋人普遍認為唐摹本更接近原本，也認為臨摹本優於刻本，但是在「臨摹本優於刻本」這一無須辯論的事實面前，依然有人提出定武拓本優於臨摹本，至少某些方面優於臨摹本的觀點。⁴⁴ 由上可知，在北宋的《蘭亭》敘事中，「定武本」《蘭亭序》還未得到所謂「以定武為第一」的特殊地位。

但是時至南宋，稱讚「定武本」《蘭亭序》的記錄開始大量增加，並逐漸成為士大夫們的「共見」。要知道早在歐陽脩（1007-1072）的時代，《蘭亭序》已然是「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⁴⁵ 而姜夔所謂「石本雜，定武行於世」的說法也不僅僅是一個客觀的描述，而應該還有其他更加深刻的原因在其中發揮著作用。在如此繁雜、多樣的《蘭亭序》版本中選擇出世人均認為最好的那一種，就需要有一個普遍的「觀念」在影響著人們取捨的態度。分析起來，主要涉及以下四個原因：

第一，「名人效應」，即源自人們對蘇軾（1037-1101）和黃庭堅的推崇。北宋的蘇軾與黃庭堅均曾對「定武本」《蘭亭序》執有肯定的態度，後人出自對蘇、黃兩人的肯定，也便承襲此二人所說，對「定武本」《蘭亭序》持肯定的態度。桑世昌《蘭亭考》卷5便載有蘇軾與其弟蘇轍（1039-1112）同觀「定武本」《蘭亭序》時的一段題跋；⁴⁶ 而黃庭堅的討論在後世流傳更廣，人們對於「定武本」《蘭亭

⁴³ 米芾〈書史〉：「泗州南山杜氏，父為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於後世者，賴存此本。」見米芾：《寶章待訪錄（外五種）》，頁34。

⁴⁴ 參見陳一梅：《宋人關於《蘭亭序》的收藏與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1年），頁148-149。

⁴⁵ 此說係出於歐陽脩：《集古錄跋尾》，卷4〈晉蘭亭修禊序（永和九年集本）〉，頁187。

⁴⁶ 《蘭亭考》卷5：「世傳《蘭亭》諸本，惟定州石刻最善。近聞此石已取入禁中，不可復得，則此本尤當貴重也。蘇軾題，轍同觀。」參見桑世昌、俞松：《蘭亭考 蘭亭續考》，頁75。

序》或贊同、或反對的意見，多與黃氏所論有關。

第二，「定武本」《蘭亭序》在南宋開始為世人推崇，與南宋皇室有關。高宗趙構（1107-1187）自稱對「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而其最為看重的，便是王羲之的《蘭亭序》，今在《寶晉齋法帖》中即可見有署名「定本蘭亭高宗皇帝御書」的「定武本」《蘭亭序》一件。他不僅稱讚《蘭亭序》「測之益深，擬之益嚴」，而且認為《蘭亭序》在王氏諸帖中字數最多，所以「玩之不易盡也」。⁴⁷高宗之後，又有南宋理宗（趙昀，1205-1264）內府收藏《蘭亭序》一百一十七種、游似（？-1252）收藏《蘭亭序》百種、賈似道（1213-1275）收《蘭亭》石刻達八千匣，形成了南宋時期複製、收藏、鑒定《蘭亭序》的熱潮，即朱熹所謂的「蘭亭如聚訟」。進而，皇室的推崇和士夫們的追捧共同構成了人們對於南宋《蘭亭序》（特別是「定武本」）發展景狀的整體印象，而後人極力推崇《蘭亭序》「宋拓本」、「北宋拓本」甚至是「唐拓本」，均與南宋《蘭亭序》的大複製和大傳播緊密相關，即人們在「復古」、「考古」或「考據」的觀念作用下，極力尋求更「古」的版本，特別是要追尋早於南宋拓本的「北宋拓」甚至「唐拓」。⁴⁸

第三，南宋人推崇「定武本」《蘭亭序》還與對「靖康之亂」的追憶有關。「定武」原為地名，即今天的河北省正定縣。此地原稱「真定」，因避宋仁宗趙禎（1010-1063）諱改稱「正定」、「定武軍」。學者陳忠康曾總結《蘭亭》版本的命名問題，認為「約有15種特點可以構成名稱的基本要素」，⁴⁹其中之一便是以「地名」來命名，如「修城本」、「九江本」、「宣城本」、「復州本」、「豫章本」等，而「定武本」亦為其中之一。在南宋人的記憶和記載中，「定武本」《蘭亭

⁴⁷ 宋高宗《高宗皇帝御製翰墨志》：「右軍他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丈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參見水賚佑：《〈蘭亭序〉研究史料集》，頁25。

⁴⁸ 今藏於日本的「韓珠船本」《蘭亭序》即號稱「唐拓」本。

⁴⁹ 陳忠康：《經典的複製與傳播——以〈蘭亭序〉版本為中心的考察》，頁18。

序》原石本為唐太宗在得到《蘭亭序》真跡後，由歐陽詢臨（摹）上石的最佳本；此本在五代時期由長安移置汴都（今河南開封），遼滅後晉時，「定武本」《蘭亭序》原石便被帶到北方，等到達定武的「殺虎林」（也稱「殺狐林」、「殺胡林」）時，遼帝耶律德光（902-947）去世，刻石便被棄於「定武」；後為當地人李學究發現，又經薛紹彭（北宋人，?-?）翻刻一石、損去五字，在北宋徽宗（趙佶，1082-1135）大觀年間，「定武」石刻又由河北定武收至「禁中」，而在「金人」推翻北宋政權的過程中，「定武」石刻再一次被「金人」帶回北方。亦有一種說法由宗澤（1060-1128）將「定武」石刻帶至「維揚」，金兵攻打「維揚」，而石刻不知所蹤。⁵⁰ 以上的記載（甚至可稱之為故事）雖然未必完全可靠，但所記述的核心問題是「國將不國」和「亡國之痛」，正如高宗趙構在一件「定武本」《蘭亭序》上的題跋，直言王羲之在「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⁵¹ 儘管他沒有直接提及「定武本」與「靖康之亂」的關係，但趙構的感慨無疑與其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臨危即位有關。隨著時代的變遷，「靖康之亂」與「定武」石刻遺失二者之間的關係逐漸為元明以後的人們所淡忘，但是這一歷史敘事卻在南宋人的文獻記載當中曾反復被提及，⁵² 應該說

⁵⁰ 趙與時《賓退錄》卷1：「《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跡刻之學士院。朱梁徙至汴都，石晉亡，耶律德光輦而歸。德光道死，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虎林。慶曆中為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置公帑。熙寧間，薛師正向為帥，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留公帑。攜古刻歸長安。大觀中，詔取置宣和殿，靖康之變，虜襲以紅毯輦歸，今東南諸刻無能仿佛者。」參見水賚佑：《《蘭亭序》研究史料集》，頁20。又，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今石刻辨》：「《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為冠。……其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珣家宣取入禁中，龕於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金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以氈裘裹之，車載而去。」參見趙希鵠：《洞天清錄》（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頁49。

⁵¹ 此說係出於《蘭亭考》卷2。參見桑世昌、俞松：《蘭亭考 蘭亭續考》，頁26。

⁵² 重要的標誌是在南宋人的文獻當中會去追記「定武石刻」流傳經過的幾個重要時間節點，並流露出對於「失」、「棄」等情感的表達，如唐太宗

南宋人對「定武本」《蘭亭序》的反覆討論和鑒賞是有著特殊的歷史回憶的。

第四，最為重要的是，南宋人在推崇《蘭亭序》的過程中，受其時代思潮影響，出現了大量考釋「定武本」《蘭亭序》的專文、專著，亦有對之特徵進行考辨的記錄，如桑世昌（南宋人，生卒年不詳）《蘭亭考》、趙希鵠（1170-1242）《洞天清錄》、曾宏父（南宋人，生卒年不詳）《石刻鋪敘》、姜夔《禊帖偏旁考》等，而這些文獻在元明以後又進一步成為後人考證《蘭亭序》的主要依據。特別是《禊帖偏旁考》⁵³為代表的《蘭亭序》特徵考證，是從器物特徵的角度

朝《蘭亭序》刻於禁中、唐末《蘭亭序》石刻遷至汴州（開封）、耶律德光滅石晉而遷出並棄於定武、薛紹彭父子得石刻後入內府（一說原石遷西安）、靖康中由內府遷至維揚，便不知其所蹤。如南宋樓鑰《攻媿集》卷2〈跋汪季路所藏修禊序〉：「耶律殘石晉，睥睨不知名。意必希世寶，氈裏載輜餅。帝昶既北去，棄與朽壤並。久乃遇知者，龕置太守廳。或云政宣間，此石歸紹彭。又言入內府，宣取恐違程。……南渡愈難見，得者輒相矜。」再如南宋王明清《揮塵錄》後錄卷3：「薛紹彭既易《定武蘭亭》石歸於家，政和中，祐陵取入禁中，龕置睿思東閣。靖康之亂，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北，而此刻非虜所識，獨得留焉。宋汝霖為留守，見之，並取內帑所掠不盡之物，馳進于高宗。時駐蹕維揚，上每置左右。逾月之後，虜騎忽至，大駕倉猝渡江，竟復失之。向叔堅子固為揚帥，高宗嘗密令冥搜之，竟不獲。（向端叔云）」以上二則資料分見樓鑰：《攻媿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卷2，頁14；王明清：《揮塵後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卷3，頁12。此類文獻很多，在此不能一一列舉，但通過閱讀此類材料可以認識到，在南宋人的這些文字記載中會在有意無意之間流露出「失」和「棄」的悲傷意蘊，如「失之於汴」、「失之於維揚」、「棄之於殺胡林」等，透過這些南宋人對於文物蒐藏情況的描述是不難體會出他們當時的亡國之痛。

⁵³ 周密〈白石禊帖偏旁考〉：「『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在』字左反剔。『歲』時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事』字腳斜拂，不挑。『流』字內『肱』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字挑腳帶橫。『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趣』字波略反卷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已開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興感』『感』字，戈邊亦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處有一闕。右法如此甚多，略舉其大概。持此法，亦足以觀天下之《蘭亭》矣。」見周密：《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12〈白石禊帖偏旁考〉，頁213。

對《蘭亭序》（「定武本」）的諸單字的細微特徵進行了分析，並認為執此則可以分辨「天下所有《蘭亭》」。此現象的背後，一方面隱含著宋人對於古器物特徵的理解態度，另一方面更表達出時人在思想觀念上執有以一種「常識為天然合理」的態度，即以某一《蘭亭序》版本的特徵為「常識」，對《蘭亭序》的理解均以之為準，這樣一來，「定武本」《蘭亭序》的基本特徵便固定了下來，不僅元、明、清諸朝對《蘭亭序》的翻刻和考釋多以《楔帖偏旁考》為重要標準，甚至時至今日，我們對於「定武本」《蘭亭序》的基本判斷依然還是依靠姜夔《楔帖偏旁考》的表述，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由上四點可知，「定武本」《蘭亭序》在其成為王羲之《蘭亭序》「最佳本」的過程中，並非僅僅因其書法或版本特徵勝於他本而受到世人的推崇，而是在摹本少見、刻本大量流行的過程中逐漸確定下來的，而在此過程中，南宋人對於北宋亡國的記憶、宋代的考古風氣亦對之發生著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四）「定武本」以「此本」為第一

據元人趙孟頫「蘭亭十三跋」所述，「定武本」《蘭亭序》在「宋未度南時」，便已經出現大量的複製和翻刻活動，即「士大夫家刻一石」，亦由此而引發了一股收藏、鑒定《蘭亭序》的熱潮，宋理宗收藏有一百一十七種《蘭亭序》，游景仁收藏有百種，而賈似道更是達到八千匣之多。「定武本」《蘭亭序》被如此大量的複製與傳播，除其作為刻本具有易於傳播的特徵外，更得益於人們對之的觀念構建，即南宋士大夫更多地認為「定武本」《蘭亭序》即是所有《蘭亭序》版本當中的「最佳」者。但是在大量複製和翻刻的過程中，新的問題亦隨之而來，即：同樣是「定武本」，但各本之間還是存在著一些細微的差別，正如姜夔曾說：『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小大，無不一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

之面，無有同者」；⁵⁴此外，不同的人依據自身的評判標準（如鑒賞眼光、審美趣味、學術主張等）還會對同一個版本產生不同的見解。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定武本」《蘭亭序》在複製和流傳過程中所產生的版本最多，那麼與之相關的各種評價和討論也就最多。在已知的「定武本」《蘭亭序》拓本中，便有所謂「未損」、「已損」、「不損」的區別，又有「肥瘦」、「精粗」的不同，因此在「定武本」成為公認的《蘭亭序》「最佳本」的過程中，勢必要面對著再一次的被「選擇」：既然「定武本」是《蘭亭序》的最佳本，那麼在諸多的「定武本」當中，究竟哪一件又可稱之為「定武本」中的最佳本呢？

雖然自北宋開始，便不斷有人將自藏或友人藏《蘭亭序》（不止是「定武本」）推為「第一」，但只有到了元人趙孟頫，才真正意義上完成了以某一本「定武本」《蘭亭序》作為書學道統典型的觀念構建。在趙氏看來，其同宗趙孟堅（字子固，1199-1264）所藏「落水本」《蘭亭序》可稱為《蘭亭序》中最為精特、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他說：「古今言書者以右軍為最善，評右軍之書者以《禊帖》為最善，真跡既亡，其刻之石者以『定武』為最善，然而紙墨有精粗，拓手有工拙，於是優劣分焉。此本紙墨精，拓手工，在『定武』中豈非至寶耶。吾觀《禊帖》多矣，未有若此本之妙者。」⁵⁵在這段表述中，不僅確立了以《蘭亭序》為核心的書學道統地位，而且將「定武本」視為「真跡既亡」情況下最為接近《蘭亭序》原貌的「最善本」，而「落水本」《蘭亭序》又是在趙氏看來紙墨、拓手俱佳的善本，由此確立「落水本」在《蘭亭》書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於趙孟頫在元、明、清三代的書法史上影響頗大，所以他對於《蘭亭序》的這一評價

⁵⁴ 姜夔《續書譜·臨摹》：「世所有《蘭亭》，何啻數百本，而『定武』為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小大，無一不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跡之風神矣。」參見王雲五主編：《書譜 續書譜 法書通釋 春雨雜述》（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5。

⁵⁵ 據清內府摹「落水本」《蘭亭序》錄入。

經王蒙(1308-1385)、宋克(1327-1387)、孫承澤(1593-1676)、翁方綱等人的記述，形成了對汪中評價其自藏「定武本」《蘭亭序》的影響：無論是文句結構或是主旨思想，汪中完全借鑒了趙孟頫在「落水本」《蘭亭序》中的表述，一步步地推導出其「四累」之說。

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必須點明：南宋朱熹(1130-1200)所謂的「蘭亭聚訟」是趙孟頫以降關於《蘭亭序》版本考辨的核心觀念背景。南宋理學家朱熹所謂「蘭亭聚訟」，⁵⁶原指南宋士人尤袤(1127-1194)和王順伯(南宋人，?-?)這兩位《蘭亭序》的收藏大家爭執於「定武」拓本的「或肥或瘦」，而這一歷史典故的背後，恰恰是朱熹所處時代關於《蘭亭序》收藏、鑒賞情況的真實寫照；加之以朱熹為集大成者的程朱理學，自南宋理宗以後成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意識形態，因此「蘭亭如聚訟」便在後人的記述中反復出現，成為關於《蘭亭序》收藏及鑒賞景況的集體記憶。

以朱熹理學為思想史背景，「《蘭亭》聚訟」的問題實指向於《禮記·大學》中「孔子」的一句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見圖14)而朱熹在《周易本義·訟卦》的義理性解讀中，將《訟卦·大象傳》中「作事謀始」一句，解為「訟端絕矣」，其指向的亦是「無訟」。程朱理學將天理作為人純化自身道德的目的，主要的修身工夫之一便是「居敬」，即常保恭敬之心，而「聚訟」所指向的是「爭鬥」和「不恭」，⁵⁷那麼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們便不可能

⁵⁶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82〈題《蘭亭序》〉：「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王順伯所藏《蘭亭敘》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箋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杜德機耳。晦翁。」參見水賚佑：《〈蘭亭序〉研究史料集》，頁32。

⁵⁷ 《周易·序卦傳》：「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按照《周易》各卦的排列順序，在〈乾〉、〈坤〉二卦之後，為〈屯〉、〈蒙〉、〈需〉、〈訟〉、〈師〉、〈比〉等卦。按照〈序卦傳〉的說法，天地自生有萬物，不能無養，故有飲食之道，即〈需〉卦(上坎下乾)；飲食必有「訟」(〈訟〉卦卦象為「上乾下坎」)，而訟必引起「眾起」，進而出現「師」(〈師〉卦卦象為「上坤下坎」)。「師」即發生軍事戰爭。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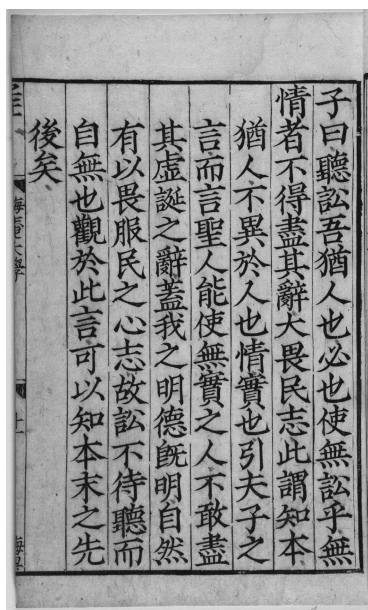


圖 1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南宋刊本⁵⁸

對「《蘭亭》聚訟」一事持有支持和肯定的態度。何況，《蘭亭序》雖然為書法名篇，卻在中國傳統社會以儒家道德為終極價值追求的大環境中，不可能與程朱所推崇的儒家孔顏之樂、孔孟之道相提並論，因此結束「《蘭亭》聚訟」成為南宋以及南宋以降執有理學態度的儒家知識分子論及《蘭亭序》的一個重要隱含觀念，即：無論是對某一種（或某一本）《蘭亭序》的肯定或否定，或者如朱耆（1626-1705）、李文田那樣對《蘭亭序》文本提出質疑和否定，這些討論者均隱含著理學家式的思想意圖來解決「《蘭亭》聚訟」的主觀意向，具體而言，可從如下三個方面加以考察：

從易卦象所指向的關係來看，「聚訟」最終所指向的即是「爭鬥」。參見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268。

⁵⁸ 朱熹：《大學章句集注》（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舊藏宋淳祐十二年當塗郡齋刻本），頁21。

第一，肯定某一「定武本」《蘭亭序》為最善本。這樣的做法最為常見，且多見於議論者對自藏或友人藏「定武本」《蘭亭序》的評價，如趙孟頫的「蘭亭十三跋」、「跋落水本《蘭亭序》」，又如清人孫承澤曾說：「昔人謂評《蘭亭》如聚訟，其實有不然者，《蘭亭》之有『定武』，如眾星之有斗，群峰之有嶽也。舉目可辨，寧待聚訟乎？《蘭亭》之妙，法度悉備而不以法見，神力具足而不以力見，所謂純綿裏鐵，此其是矣。」⁵⁹

第二，由於「《蘭亭》聚訟」起於世人對「定武本」的推崇，因此回答「《蘭亭》聚訟」時，便有人以另外一種或幾種《蘭亭序》版本否定「定武本」，如董其昌推崇「開皇本」和「唐摹本」而否定「定武本」便有此意義。⁶⁰

第三，由於「《蘭亭》聚訟」是對《蘭亭序》的不同意見和態度，因此否定《蘭亭序》本身，亦可以達到結束「《蘭亭》聚訟」的目的，因此朱奩以《臨河序》質疑《蘭亭序》文本、阮元以「永和磚字」質疑《蘭亭序》書法，乃至李文田提出「蘭亭三疑」，亦均可視為回應「《蘭亭》聚訟」的某種表達。

在上述三種不同的回答「《蘭亭》聚訟」的方式中，以第一種做法最為常見，因為在義理化儒學的影響下，對於某一版本的義理化解釋和特定觀念構建最為容易；而後兩種做法只有在社會觀念或學術風氣發生重大變革時才會突顯出來。自宋末元初開始，人們對於「定武

⁵⁹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4〈定武楔帖瘦本〉。參見孫承澤、高士奇：《庚子銷夏記 江村銷夏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84。

⁶⁰ 董其昌：「《蘭亭序》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刻者，唐文皇因見刻本，遂訪真跡，於越州辨才得之，命湯普徹、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定武』為歐陽詢摹，下真一等。群公聚訟，緣此而起，以至點畫波撇之間，各加辨證。又有五字損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闕有全，紛紛同異，如王順伯、尤延之輩。而吳興踵之為十三跋、十七跋，獨尊『定武』，不知右軍肯點頭否也？」見董其昌著，邵海清點校：《容臺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別集卷2，頁616。

本」《蘭亭序》的認知進行了程朱理學式的觀念構建，經過此一「構建」的「定武本」《蘭亭序》不僅獲得了《蘭亭序》第一的書學正統地位，而且將《蘭亭序》等同於儒家《六經》的觀念隨之出現。⁶¹由此可知，從王羲之被尊為書聖到《蘭亭序》成為王羲之書風的代表再到「定武本」《蘭亭序》成為書學道統中的核心和最為重要的一篇書法名跡，一直經歷著時代對之的觀念構建和影響，《蘭亭序》一步步成為書法「圭臬」的過程，正反映著中國書法與儒家思想之間緊密而生動的互動關係。

綜上所述，「定武本」《蘭亭序》在宋代成為《蘭亭序》諸版本中最為經典和最為重要，並不是由其自身的書法成就確實超越其他《蘭亭》版本所致，而是在宋代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思維方式下被逐漸固定下來的，加之元代趙孟頫的進一步推崇和觀念構建，遂逐漸成為《蘭亭序》版本中的主流，並一直影響到清代乾隆年間的汪中對於其自藏「定武本」《蘭亭序》的觀念構建。當這一觀念構建未被「打破」之前，人們對於「定武本」《蘭亭序》的態度呈現出基本穩定的態勢，但一旦在社會觀念發生重大的變化時，人們對於「定武本」《蘭亭序》的態度便很難不發生新的變化，這就是後來阮元、李文田等人對《蘭亭序》提出質疑的思想根源。

⁶¹ 陳方所言，參見趙琦美《趙氏鐵網珊瑚》卷1〈蘭亭舊刻〉：「《蘭亭詩序》為書家之六經，而善本絕難得，學書之士雖不得善本，苟能彷彿於其次者，亦勝於學世俗書也。近自吳興趙魏公書法遍海宇，學者僅得其形似，而古意皆無，如啖蔗徒咀嚼，其餘全不見其味耳。孤蓬倦客陳方題。」又如《趙氏鐵網珊瑚》卷1〈題蕭翼賺蘭亭圖〉張遜說：「字書為六藝之一，使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蘭亭帖》其一也。當右軍燕集時，書以紀一時之事，初不計其傳遠與否也。自定武墨本散落人間，孰不取法焉。然以天下之廣，歲月之既多，無一人能及之者。已往者不可見，其來者未可知，藝之至於善，無以加矣。世之堅良者莫貴於黃金白璧，萬毀萬滅淪於瓦礫者何可勝數。而此墨紙也，後人寶之者，則指之曰此吳景文家所藏，某字闕某字損，視千載如昨日，則其所謂堅良者不知幾成毀矣。一藝之精可傳不朽，況其大者乎。張遜題。」參見水賚佑：《〈蘭亭序〉研究史料集》，頁205、206。

四、「汪中舊藏《定武蘭亭》」 與「蘭亭論辨」的產生

(一)「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產生「蘭亭論辨」的 「導火索」

在郭沫若質疑《蘭亭序》並引發「蘭亭論辨」之前，「汪中舊藏《定武蘭亭》」雖然已歷經多家收藏並有摹刻本和影印本傳世，但相比於其他著名的「定武本」《蘭亭序》而言，其影響範圍還是相當有限的；從其版本特徵上來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雖保有「定武五字不損本」《蘭亭序》的基本特徵，但其剝損較為嚴重，亦非足以取法和臨摹的佳品，因此，如果不是「蘭亭論辨」對「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中「李文田跋文」的徵引，那麼「汪中舊藏《定武蘭亭》」或許只是諸多「定武本」《蘭亭序》中的一個，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價值，但恰恰是「蘭亭論辨」使得「汪中舊藏《定武蘭亭》」聞名於世，成為今天討論「蘭亭論辨」所必須加以討論的一個《蘭亭序》版本。

1. 「汪中舊藏《定武蘭亭》」是「李文田跋文」的基本語境

在「蘭亭論辨」的諸多討論中，「李文田跋文」是一段被反復提及的史料。在李文田看來，《蘭亭序》在文本上與《世說新語》中的《臨河序》有諸多出入，而從書法角度來看又與其時代相近的「二爨」不類，在「文尚難信，何有於字」的邏輯推演下，《蘭亭序》被確定為「偽作」，便是自然而然的了。郭沫若在看到「李文田跋文」之後，便加以引用、發揮，還結合當時新出土的「王謝墓誌」再一次提出並「論證」了《蘭亭序》不可能為王羲之原作的觀點。幾十年來，相信《蘭亭序》為真的學人們曾嘗試從各個角度來論證《蘭亭序》為「真」，但始終無法跳脫出「蘭亭論辨」的「窠臼」。究其原因，與他們孤立地看待「李文田跋文」以及未重視對「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系統研究不無關係。

作為「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中的一段題跋，「李文田跋文」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與汪中「修禊敘跋尾」相呼應，其所立論出發點針對著「修禊敘跋尾」而來，這在「李文田跋文」中是有明確表述的，甚至其論證方式也源自於「修禊敘跋尾」；另一方面，李文田肯定了「修禊敘跋尾」中所引趙魏所執論點——「右軍雖變隸書，不應古法盡亡」，並明言其所論「亦足以助趙文學之論」。這樣一來，「李文田跋文」便不再是一個孤立的文本，而是與「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中的「修禊敘跋尾」、「趙魏（1746-1825）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兩則跋文之間相互關聯的一段題跋。郭沫若引用「李文田跋文」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對《蘭亭序》提出質疑，因而對李、汪、趙三人這三篇題跋之間的關係未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討論，而高二適因為並不了解「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及其諸題跋之間的關係，⁶² 因此他的「《蘭亭序》真偽駁議」也便難以對郭沫若所執論點能夠予以有效的「駁議」了。

誠然，從書法史的角度來看，「李文田跋文」作為一篇獨立的《蘭亭》題跋，通過文獻和實物兩個角度提出了對《蘭亭序》的質疑，雖然「難以立論」，但也能自圓其說，或可謂之「一家之言」；可是從觀念史的角度來看則不是這樣的，「李文田跋文」並非一篇孤立的文本，

⁶² 高二適在當時敢於向郭沫若提出「駁議」甚至希望得到中央高層的支持，其人品和勇氣為後人所津津樂道，但是由於高先生並不了解郭沫若為何要撰寫質疑《蘭亭序》的文章，也不了解郭沫若所引「李文田跋文」與「汪中舊藏《定武蘭亭》」，所以他所撰寫的《〈蘭亭序〉真偽駁議》可謂是「先天不足」，根本不可能在理論上駁倒郭沫若的觀點。高二適不了解「李文田跋文」與「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在其文章中是有體現的：其一，高氏依郭沫若文章中所論，也認為李文田題跋時，「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為端方收藏，其實這是郭沫若的一個錯誤觀點，但高二適並未對之加以考察和討論；其二，高氏在論及趙魏時，也是依據郭沫若所引「李文田跋文」和「修禊敘跋尾」立論的，而不知趙魏在其〈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中已明言「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為《蘭亭》善本且提到他與汪中有「同心」之誼。儘管趙魏的這段題跋未必發自真心，但至少文字上是有利於高二適，因此可以說高二適有可能並不知道趙魏這段題跋的存在。

而是「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因此要想回應「李文田跋文」以及由「李文田跋文」所引發的「蘭亭論辨」，就需要回到產生「李文田跋文」的語境中去尋找答案，也就是說，要在通過對「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梳理和討論中去尋找答案。

2. 「汪中舊藏《定武蘭亭》」與清代中期以來的「蘭亭」質疑

「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之所以重要，不僅僅在於它是產生「李文田跋文」的史料背景和基本語境，更在於它與清中期以來人們對於《蘭亭序》的質疑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熟悉清代書法史的人們都知道，清乾隆年間是帖學走向勢微、碑學開始興起的重要時期，清代的書法史亦可以乾隆朝為分水嶺，分為前期與後期兩個大的階段：前期主要承接著宋、元、明三代以來的「帖學」，⁶³而作為「帖學」體系中的核心和經典，《蘭亭序》（特別是「定武本」《蘭亭序》）還是受到世人的普遍推崇；而後期則從乾隆年間開始，隨著考據學的興起與成熟，加之人們普遍認識到刻帖在歷代的流傳和翻刻過程中已然是「面目全非」，具體在《蘭亭序》的版本上，又有所謂「歐」、「褚」兩大體系之爭，因此在考據學和碑學興起的同時，便開始出現了關於《蘭亭序》的質疑。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自宋代開始便已經有人提出對《蘭亭》種種疑問，但此時的討論或是有關不同版本之間優劣的討論（如損字、肥瘦等），或是就《蘭亭序》文是否為「佳文」的問題（如有人提出「天朗氣清自是秋景」、「絲竹管弦」行文重複等），但終究未對《蘭亭序》本身「真」或「偽」的問題提出質疑。直到明末清初「八大山人」朱耷才有意識地提出《蘭亭序》文與《臨河序》不合的問題，但也未加以進一步的

⁶³ 「帖學」一詞正式出現在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是相對於「碑學」而提出的一個書法概念。康有為說：「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見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年），卷1，頁11。此處所用「帖學」泛指以刻帖為主要取法對象的書學思想和書法體系，其起點可上溯至北宋淳化年間的《閣帖》。

討論。直到清代乾隆年間，才開始出現直接質疑《蘭亭序》本身的真偽問題，即世人所熟知的阮元、孫星衍（1753-1818）、趙魏、趙之謙（1829-1884）等人的觀點。那麼這與「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又有什麼關係呢？

汪中「修楔敘跋尾」是一篇運用清人考據儒家經典文獻的方式對《蘭亭序》加以討論的文本，而與汪中同時代而略早的翁方綱，雖然也著有《蘇米齋蘭亭考》，但卻是延續著宋人以來對於《蘭亭序》考證的基本方式，即以器物考證的方式對《蘭亭序》的版本特徵進行梳理和研究，其理論的基礎和核心是南宋姜白石的「楔帖偏旁考」。汪中則不然，他不僅摒棄了「楔帖偏旁考」一類的特徵考證方式，而且一方面徵引古代文獻確定「定武本」《蘭亭序》源自歐陽詢依王羲之《蘭亭序》摹勒上石，而非歐陽詢臨本上石；另一方面又引《始平公造像記》、《吳平侯神道刻石》等古代刻字遺存來證明「定武本」《蘭亭序》的書跡保留著所謂「隸書遺意」，以反駁趙魏「右軍雖變新體，不應古法盡亡」的觀點。如果我們以「修楔敘跋尾」來對比「李文田跋文」便不難看到，李文田提出《蘭亭序》質疑時，雖然他的觀點與汪中相左，但是汪、李二人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卻是一致的，即從文獻和古物兩個層面分別加以論證的方式，這一方式也就是後來為歷史學界所普遍使用的「兩重證據法」。由此可見，清中期以來關於《蘭亭序》真偽問題的提出，與其說是碑學和考據學的影響所導致的，還不如說是舊的研究方法為新的研究方法所取代而造成的，而並沒有觸及到真正意義上的《蘭亭序》「真」或「偽」的問題。

而在汪中和李文田之間，還有阮元、孫星衍、趙魏、趙之謙等人曾對《蘭亭序》提出過質疑，他們或是在「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中題有觀款或者題跋，或是有機會見到「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原件或者汪中《述學》中所載的「修楔敘跋尾」，雖然目前尚沒有足夠的證據能夠證明阮元、孫星衍等人的觀點與「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直接相關，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對於「汪中舊藏《定武蘭

亭》」特別是其中的「修禊敘跋尾」並非一無所知，所以「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及其中的「修禊敘跋尾」極有可能是引起清中期以來《蘭亭》質疑的一件重要的《蘭亭序》版本。

雖然在歷史上有焦循（1763-1820）、何紹基（1799-1873）等人曾極力讚揚過「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和「修禊敘跋尾」，但是針對這件「定武本」《蘭亭序》，更多的卻是對其的否定和質疑，除李文田外，還有吳讓之（1799-1870）、楊守敬（1839-1915）、震鈞（1857-1920）、完顏景賢（1876-1926）、姚大榮（1860-1939）等。⁶⁴ 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是這件「定武本」《蘭亭序》本身品相並不算是善本，雖然「五字不損」，但是剝損較為嚴重；其二是這件「定武本」《蘭亭序》為汪中所收藏時，「裝潢潦草，紙墨如新，無印章款識」，足見其並非流傳有自之本，可是在汪中「修禊敘跋尾」的開篇，但將這件「定武本」《蘭亭序》確定為「天下法書第一」的最佳傳世本。無論汪中是有意誇大，或是重述前人，「四累說」的贊譽實不應置於「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身上」。加上汪中之子汪喜孫（1786-1847）對汪中

⁶⁴ 吳讓之曾在「開皇本」《蘭亭序》後的題記中說：「定武真本亦未之見，江都汪氏有一本，自斷為定武本，北平翁氏亦弟許為舊拓。」見王羲之著，吳讓之題記：《開皇本蘭亭序》（上海：有正書局，1917年印本），頁7；楊守敬在「梅生藏吳讓之題簽」的一件「定武本」《蘭亭序》上提及曾見過「容甫本」，稱「定武蘭亭在宋代士大夫家刻一本，遊丞相家收至數百本。今日即是宋拓，亦大抵重刻。其流傳有序者，趙子固落水本、榮芑本、趙松雪獨孤本，餘所見周杏農五字不損本、臨川李氏所藏孫退谷五字已損本、又德化李木齋所藏柯九思後半本。其他所謂八潤九修本，汪容甫所藏五家不損本，餘亦見之，雖有各名家題跋，未可信為原石也。」見傅紅展、趙國英、馮建榮主編：《蘭亭書法全集·故宮卷》第3冊（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年），頁17-18；震鈞在對比了「汪中舊藏《定武蘭亭》」與自藏「九字損本」《蘭亭序》後，認為二者同出一時，皆為宋翻「九字損」本。見傅紅展、趙國英、馮建榮主編：《蘭亭書法全集·故宮卷》第2冊（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年），頁42；完顏景賢為「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藏家之一，其跋文中將此本與遊相《蘭亭》「續時發本」相比較，認為二者皆出於一石，為「會稽本」。日本有關研究亦依據完顏氏所言稱「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為「會稽本」。見抱殘守缺生：〈現存《蘭亭序》的主要刻本〉，《書苑》第2卷第4期（東京：三省堂，1938年），頁44。

以及「舊藏定武本《蘭亭序》」的極力宣揚，於是便造成了自嘉慶年間開始直到民國初年之間人們對於「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種種批評的聲音。由此可知，李文田雖然不是最後一個否定「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清代學者，但也不是第一個或唯一的一個，只是他的論證最為清晰和完整，可以為郭沫若所引用並提供理論依據罷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幾乎可以看作清中期以來與《蘭亭》質疑最有關係的版本之一，除上述外，還有兩件實物特別值得注意：其一為清光緒十三年（1887）汪宗沂（1837-1906）仿「汪中舊藏《定武蘭亭》」所裝池的一件「定武肥本」《蘭亭序》，此本現藏在上海圖書館，在其最後一跋中汪宗沂論及《蘭亭序》的真偽問題，指出「近世以來」多有質疑《蘭亭》者，為「漢學家輕詆宋人之習氣」，而這段題跋早於「李文田跋文」兩年提出；其二為民國十七年（1928）經潢川吳氏重裝的一件《十七帖》拓本，此本有明晉藩印章，清初由「快雪堂」馮銓收藏，後為汪中所收並為之題簽，現藏於開封博物館，在此本中有王德文（民國間人，?-?）於1928年的一段題跋，直言《蘭亭序》「出於唐人臨撫，征諸典籍與六朝時文且不同，實為贗書」，⁶⁵此觀點明顯繼承自李文田「蘭亭三疑」。這兩件拓本，其一為仿「汪中舊藏《定武蘭亭》」裝池，其一為汪中的舊藏物，二者均提及《蘭亭序》的真偽問題，如果不是出於巧合，那麼就可能由「汪中舊藏《定武蘭亭》」所引發的《蘭亭》真偽質疑在歷史長河中所形成的「波瀾」吧。

（二）郭沫若在「蘭亭論辨」中對「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三處「誤讀」

由上可知，在1965年郭沫若撰寫質疑《蘭亭序》並引發「蘭亭

⁶⁵ 故宮博物院編：《王羲之王獻之書法全集》第14冊（北京：故宮博物院，2015年），頁42。

論辨」時，「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為郭沫若的立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即「李文田跋文」所提出的「蘭亭三疑」。可是在此後的幾十年間，由於人們未對「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及其相關史料做細緻的梳理和考察，以致於郭沫若在使用「汪中舊藏《定武蘭亭》」時所產生的三處「誤讀」長期未能釐清。儘管這三處「誤讀」看似無關大礙，但可以從一個側面重新審視「蘭亭論辨」。

1. 誤讀一：李文田題跋時，「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究竟由誰收藏？

在〈從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中，郭沫若第一次向人們提出李文田題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時，這件《蘭亭序》為清人端方收藏。⁶⁶ 其後與之論辨的高二適，也沿用了這一說法，稱李文田所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為端方（1861-1911）所收藏。⁶⁷ 於是在此後的幾十年間，學界一直沿用這一說法，直到2013年9月，才由李文田的後人李軍偉撰文予以澄清：其實李文田作跋時，「汪中舊藏《定武蘭亭》」應為儀征張丙炎（1826-1905）所收藏。那麼郭沫若為什麼會將張丙炎誤認為端方呢？郭沫若的「端方說」又是從何而來的呢？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就需要回到「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中去尋找答案了。

郭沫若的「端方說」基於兩點：其一是「李文田跋文」的文末提到，他的這段跋文是為「午橋公祖同年」所題寫的，⁶⁸ 而在「汪中舊藏

⁶⁶ 郭沫若言：「事實上《蘭亭序》這篇文章根本就是依託的。這到清朝末年的光緒十五年（1889）才被廣東順德人李文田點破了。他的說法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後的跋文。汪中藏本後歸端方收藏，李的跋文就是應端方之請而寫的。」見郭沫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頁7。

⁶⁷ 高二適言：「原文尤其是席清季順德李文田題滿人端方收得吾鄉汪容甫先生舊藏『定武禊帖不損本』的跋語之勢……論定《蘭亭序》不僅從書法上來講有問題，就是從文章上來講也有問題。」見高二適：〈《蘭亭序》的真偽駁議〉，《文物》1965年第7期，附錄頁1。

⁶⁸ 李文田在跋文文末曾記述：「光緒乙丑，浙江試竣，北還過揚州，為午橋公祖同年跋此。順德李文田。」這句話在郭沫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中並未引用。據李鷺哲所作《李文田年譜長編》考

《定武蘭亭》（珂羅版）當中的「李文田跋文」之後，正是端方的一段題跋，講的是完顏景賢在收藏到「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原件之後，又在鎮江焦山碑林拓得「鍾摹本」，並將「鍾摹本」裝裱於原帖之後的事。由於端方的字是「午橋」，如果不去仔細考證，很容易便「想當然」地認為李文田題跋時的「午橋公祖同年」，便是端方這位「午橋」了。

經查，清代字「午橋」者頗多，據統計有程夢星（康熙間人，1678-1747）、裴宗錫（雍正間人，1712-1779）、潘端（乾隆間人，?-?）、袁甲三（1806-1863）、朱百度（?-?）、⁶⁹張丙炎（1826-1905）、端方（1861-1911）等七人，絕非端方一人。所謂「公祖」，為舊時對知府以上地方官吏的尊稱；「同年」，指在同一年的科舉考試得中的士子們的互稱。張丙炎為揚州人，與李文田同為咸豐九年（1859）進士，曾任廣東廉州府知府，1889年時正在揚州。而端方，1882年由蔭生中舉人，到了1898年才出任直隸霸昌道。所以端方既不可能與李文田「同年」，亦不可能是李文田所稱的「公祖」。這也就是說，與李文田「同年」、字「午橋」又任過「知府」可稱為「公祖」且此時在揚州者，唯有張丙炎一人，而且張氏頗富收藏，所以張丙炎無疑是為此時收藏此帖的實際收藏者。

但是，端方與「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之間是不是就沒有關係呢？當然不是，因為端方在「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中確有一段題跋（位於「李跋」之後），而且位於珂羅版本的最後兩頁，沒有明確的紀年資訊。如果研究者不對之進行仔細考證的話，很容易想當然地認為端方就是「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收藏者。結合現有研究，

證，光緒十五（1889）年六月，李文田奉旨赴浙江任鄉試正考官。鄉試結束後，八月在返回北京途中路過揚州，為「午橋公祖同年」寫此跋文，十月「抵京」。可見，這位「午橋公祖同年」即是「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收藏者。但李鷺哲的研究沿用了郭沫若的說法，認為「午橋」為端方。參見李鷺哲：《李文田與「清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頁182。

⁶⁹ 朱氏與王引之（1766-1834）為表兄弟。



圖 15：郭沫若臨《蘭亭序》（此件原件贈與羅培元）⁷⁰

⁷⁰ 郭沫若臨《蘭亭序》，見車永仁編：《蘭亭序書畫雅集：古今名家墨跡》（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頁47-49。

可以認定在1907至1908年間，端方是有可能實際收藏了「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只是不像郭沫若所說，在李文田題寫跋文的1889年，端方便已收藏此帖。

2. 誤讀二：郭沫若究竟如何見到「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珂羅版？

如果說郭沫若在對於「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收藏和流傳情況不甚了解的情況錯誤地提出「端方說」尚情有可原的話，那麼郭沫若從誰那裡看到「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及其「李文田跋文」這件事，亦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使人讀起來頗感蹊蹺。

按照郭氏自己的說法，他看到的「汪中舊藏《定武蘭亭》」是由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陳伯達（1904-1989）轉贈，這在1965年6月發表在《光明日報》和《文物》上的〈從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中，均有明確的表述，⁷¹但是到了1973年文物出版社編輯《蘭亭論辨》一書時，「郭文」中相關的內容被刪除了。⁷²按照學者祁小春的說法，這是由於此時陳伯達在黨內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點名批評所致。⁷³一般而言，作者本人對於自己親身經歷且並不久遠的事情應該不會出現大的錯誤，因此郭沫若所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源自陳伯達的說法成為「蘭亭論辨」中不必去討論的問題。

可是郭沫若的好友兼學生羅培元（1917-2007）卻為學界提供了另外一個關於郭沫若如何獲得「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說法。在

⁷¹ 分別參見祁小春：〈關於「李文田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蹤跡及其相關問題〉，《美術觀察》2017年第2期（2017年2月），頁26；祁小春：《山陰道上——王羲之書跡研究叢筭（增補修訂版）》（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7年），頁36。

⁷² 改為：「……他的議論頗精闢，雖然距今已七十五年，我自己是最近才知道有這篇文章的。我現在率性把李文田的跋文整抄在下邊……。」參見郭沫若：〈從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收於文物出版社編：《蘭亭論辨》（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頁11。

⁷³ 分別參見祁小春：〈關於「李文田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蹤跡及其相關問題〉，頁26；祁小春：《山陰道上——王羲之書跡研究叢筭（增補修訂版）》，頁36。

〈登高行遠我負其導——從郭沫若同志遊、學之雜憶〉一文中，羅培元提及郭沫若「大概是1963年」⁷⁴到其家中見到「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珂羅版本，當讀到「李文田跋文」時，郭沫若非常高興，認為李文田對於《蘭亭序》的三點質疑是「大見解」，與他正在做的通過《王興之墓誌》和比較《蘭亭序》與《臨河序》之間差別來討論《蘭亭序》的真偽問題的想法不謀而合，於是郭沫若便從羅培元處借得「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珂羅版本，隨後便有了郭沫若〈從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以及後來的「蘭亭論辨」。⁷⁵

⁷⁴ 學者毛天玕指出應是1965年。參見毛天玕：〈《蘭亭序》世紀大論辨〉，《檔案春秋》2005年第12期，頁12。

⁷⁵ 羅氏在文中寫到：「郭老對古代名家的字很有興趣。在端州，他摸挲許多碑文，特意指引我看李北海寫的碑文。他也欽佩李氏的為人，認為歷史上寫得好字的人多如牛毛，學習寫字的人不要依樣畫葫蘆，重要的是寫出自己的風格。他曾要我借包世臣的《藝舟雙楫》給他看，叫我有空也看看，說包對執筆運鋒，研究獨到，學書者涉獵一下也好。我當時心目中除了『大王』之外，容不下別人。可是他說，世傳王羲之的字多為偽託，這可令我感到突然。一次，大概是1963年，他到我家一趟，看見我寫字桌上有一本在文德路舊書店買到的《蘭亭序》定武刻本的影印本，他一口氣把本子裡粵學者李文田的跋文讀完，說李氏有大見解，認為今本《蘭亭序》是後人偽託，與他這位也是蘭亭懷疑派的論斷不謀而合，他越讀越顯得高興。原來郭老正從新出土的晉代墓碑——特別是王羲之的兄弟王興之墓碑文仍多為隸書體而證明後來流行的《蘭亭序》帖是後人偽託之作，又從《蘭亭序》與《臨河序》對比中看出連序文也是偽託。這次郭老看到李文田對《蘭亭序文》早於他已提出三大疑點，李氏又寫出『文已無有，何有於字』（『李文田跋文』原文中作『文尚難信，何有於字』——引者注）的『千萬世莫敢出口』的大膽論斷，就無異於又找出一個百多年前學者的『同調』，其高興可知。這些論斷，豐富了郭老自宋以來所涉獵到的懷疑《蘭亭序》的見解，這也是後來郭老據以同章士釗、高二適以至商承祚的這些對王序肯定派的論辨的主要根據之一。郭老1965年在《文物》雜誌上寫的文章，把李文田的定武本跋文全登了出來，並且說是『我自己最近才知道有這文章的』。可見當時郭老看了我的《蘭亭》藏本中李氏的跋文十分高興，是事出有因的。本來我當時正在習寫《蘭亭序》，對定武本的字體愛不釋手，但郭老既然要了，我不得不『謹送』了。郭老答應日後交文物出版社翻印出來後送我兩本，但後來郭老沒有實現這諾言。1965年6月中旬，郭老夫婦小住白雲山莊休憩，由於郭老興至，分別於12日夜和次日晨默臨《蘭亭序》兩本。在我陪他們去汕頭的前兩天，他們相見了，郭老拿他默臨的兩帖給我，並問我要哪一本，我說兩本都要，他哈哈大笑，



圖 16：廣州古籍書店

（即羅培元提到的文德路古籍書店；筆者於2019年3月拍攝）

在記述這一事件的過程中，羅培元有意無意間透露出兩點重要的資訊：其一，羅培元明確提出郭沫若是看了自己贈送給他的「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珂羅版本才寫出了相關的論文，而非得自陳伯達；其二，郭沫若在借走羅氏所藏「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珂羅版本時答應會日後交由出版社翻印，但最終此事未能落實。⁷⁶ 這樣一

隨即給我12日夜臨的一本，我陪他們到了汕頭。18日早上他問我要了去，在帖尾加上『羅培元同志以韓珠船舊藏《定武蘭亭》影印本相贈，書此以報之，郭沫若補注於汕頭』。他大概想起我在廣州講過的『兩本都要』的話，又慷慨地將他另一本送給我。在帖末注上『培元同志惠存沫若默臨第二本』。這樣，我便成了『舉世無雙』的兩本郭臨《蘭亭序》的擁有者了。這比郭老未實踐的寄我翻印的定武本不更珍貴千萬倍嗎？」參見羅培元：〈登高行遠我負其導——從郭沫若同志遊、學之雜憶〉，收於郭沫若故居、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編：《郭沫若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頁106-108。此外，毛天珩曾在《〈蘭亭序〉世紀大論辨》一文徵引過羅培元這段文字，但並不完整且有個別錯字。

⁷⁶ 按照學者邢照華的說法，郭沫若因為工作繁忙而忘記回贈。其實不然，郭沫若在得到「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珂羅版本之後，並沒有依其所言交由出版社翻印。直到今天，「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也只有清代摹刻本、清代雙鈎本和民國珂羅版影印本傳世。參見邢照華：〈郭沫若致「蘭

來，郭沫若獲得「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管道便有了截然不同的兩個：其一為郭沫若自言的得於陳伯達，其二是羅培元所述的得於自己。那麼這兩種說法哪一種才更接近真相呢？

儘管歷史的許多細節無法完全準確的復原，但單就此事而言，羅培元的說法更具有信服力。從二者的記述情況來看，「郭文」只是講到此帖由陳伯達提供給他，但陳伯達為什麼要為其提供這樣一件「定武本」《蘭亭序》呢？而且在哪裡提供、什麼時間提供、如何提供的細節也均未言及；而羅培元詳細記述了時間、地點、從哪裡購得此帖以及郭沫若在讀帖過程中的現場情況，⁷⁷ 特別是羅培元所引 1965 年「郭文」中「我自己最近才知道有這文章的」一句，在「郭文」的原文中實為「我自己是最近由於陳伯達同志的介紹，才知道有這篇文章的」，足見羅培元或是礙於情面才未將郭沫若「說謊」的事實說破。實際上，他才應是真正的為郭沫若提供「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那位藏家。很明顯，以當時陳、羅二人所處的職務和工作性質來看，郭沫若以陳伯達「代替」羅培元來作為「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提供者」，更具有現實的影響力和話語的權威性，這可以理解為是出於某種現實的需要；而在 70 年代初陳伯達受到批判和開除黨籍之後，《蘭亭論辨》的編輯者或者郭沫若本人將「陳伯達」的名字從「郭文」中刪去，則是在陳伯達已然成為被批判對象的情況，那麼再把他的名字留在文中便顯得不那麼合乎時宜了。

3. 誤讀三：郭沫若「隱瞞」「趙魏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

由於「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久未現世，所以在以往的討論中，學者們較多依據「郭文」所著錄的「李文田跋文」做更進一步的探

亭富翁」羅培元的一封信解讀》，《檔案與建設》2010 年第 6 期，頁 37-38。

⁷⁷ 此外，羅培元在其回憶錄《無愧的選擇》一書中提及曾在文德路購買《胡適文存》，時間大致在 20 世紀 50 年代「胡適批判運動」期間。可見，羅氏從文德路古籍書店購得「汪中舊藏《定武蘭亭》」是完全有可能的。見羅培元：《無愧的選擇——羅培元回憶錄》（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 年），頁 562。

討，而缺乏對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中其他相關題跋資訊的關注和研究，最為典型的，即是對清人趙魏的相關題跋認知不足。趙魏即汪中「自跋文」和李文田「跋文」以及郭沫若文中所談到的那位「趙文學」。在「蘭亭論辨」中，趙魏被郭沫若「設定」為李文田的「先驅」，所以在其寫作過程中，僅引用了汪中跋文中所轉述的趙魏觀點來支持自己的觀點，而未對趙魏在「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中的一段自跋文進行討論，而這段自跋文恰恰是與汪中所轉述的觀點相左。在此意義上講，郭沫若有故意「隱瞞」「趙魏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之嫌。

趙魏生於清乾隆十一年（1746）、卒於清道光五年（1825），浙江仁和人（今杭州），生前共歷經清代乾隆、嘉慶、道光三朝。他曾遊於畢沅（1730-1797）陝西幕府，奚岡（1746-1803）曾為其制「晉齋書畫」印章一枚，黃易（1744-1802）也極為推重此人。在「修禊敘跋尾」中，汪中曾經提到趙魏所謂「右軍雖變新體，不應古法盡亡」的觀點，並依據《始平公造像記》、《吳平侯神道刻石》中的字跡加以反駁。在「蘭亭論辯」中，趙魏被郭沫若「設定」為李文田的「先驅」，也就是先於李文田提出對《蘭亭序》真偽質疑的一位清代學者。「蘭亭論辨」數十年來，人們在提及趙魏時均順著郭沫若的設定將其視為李文田的「先驅」，卻沒有學者發現或留意到在「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中，還有一段趙魏自己的跋文，其中所述恰恰與世人所熟悉的「趙魏」有所不同。

乾隆五十九年（1794）汪中去世後，其子汪喜孫繼承了這件《定武蘭亭》，並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不斷請人題跋、鑒賞。在汪喜孫收藏此帖期間，不僅有張敦仁（1754-1834）、孫星衍、趙魏、阮元、翁方綱等人為之題跋、款識，而且他還請學者王引之、凌廷堪（1757-1809）等人為其父汪中撰《行狀》、《墓誌銘》，還延請書家伊秉綬（1754-1815）以其隸書為汪中墓書寫墓碑「大清處士汪君之墓」八字，又請黃承吉（1771-1842）、李兆洛（1769-1841）、祁春園（1793-1866）等人為紀念汪中在揚州文昌閣、鎮江文津閣和杭州文瀾閣校訂

《四庫全書》而撰寫了三篇文章。⁷⁸ 如此種種均在說明，汪喜孫在汪中去世後曾極力推崇其父汪中和這件由其父收藏的《定武蘭亭》「五字不損本」，「趙魏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便是其中之一。

清嘉慶十八年（1813），汪中的舊友趙魏來到揚州，汪喜孫便請其依汪中「修禊敘跋尾」（原稿）為「汪中舊藏《定武蘭亭》」題寫跋文，在其錄完「汪跋」之後，趙魏寫到：「嘉慶十八年春，余遊學邗江，重過問禮堂。孟慈世講盡出所藏『周玉虎符』、『齊陳氏簋』、『漢射陽畫像』。摩抄響拓，竟日劇話，故友容甫所遺也。容甫文學之餘，即握管作書。楷法歐陽，行法《聖教》，晚年醉心《蘭亭》，日臨一過。讀其所跋數千言，論《定武》實出右軍，為桑氏《博議》中所未經見，洵具千百年眼者。所得之本，較吾家松雪翁為尤。最宜其泊然無營，知足之樂，余二人有同心耶？容甫往矣，孟慈恂恂儒雅，先志克承，以手澤遺跋僅三行而止，屬余補書，以妥先志。余年來目眊指搖，辭不獲已，勉力應之，聊慰仁孝之用心，不計工拙也。清和月之廿二日，晉齋趙魏書並識。」⁷⁹ 趙魏在跋文中不僅言及寫此跋文的寫作背景，如「嘉慶十八年春，餘遊學邗江，重過問禮堂」之類，還特別提及汪中讀書之餘常常臨池作書，取法歐陽詢和《集王聖教序》。汪中晚年得《定武蘭亭》「五字不損本」，便又醉心於《蘭亭序》，「日臨一過」。他還特別說到：「讀其所跋數千言，論《定武》實出右軍，為桑氏《博議》中所未經見，洵具千百年眼者。所得之本，較吾家松雪翁為尤。最宜其泊然無營，知足之樂，余二人有同心耶？」汪中嘗言：「今體隸書以右軍為第一，右軍書以《修禊敘》為第一，《修禊敘》以《定武》本為第一，世所存《定武》本以此為第一。在於四累之上，故天下古今無二。」⁸⁰ 又說：「《蘭亭》出右軍可

⁷⁸ 參見李保華：〈關於汪中校書精法樓的三篇佚失碑記拓片及說明〉，收於趙昌智主編：《揚州文化研究論叢》第11輯（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頁1-11。

⁷⁹ 文字部分見水賚佑：《《蘭亭序》研究史料集》，頁798。

⁸⁰ 水賚佑：《《蘭亭序》研究史料集》，頁490。

無疑，然又以為有真稿二本，唐人所者，稿耶？真耶？」⁸¹可見汪中認定《蘭亭序》出自王羲之親筆。汪氏又認為：「趙承旨得《獨孤長老》本，為至大三年。承旨年五十有七，其本乃『五字已損』者。中生承旨後五百年，聲名、物力，百不及承旨，今年四十有二而所得乃『五字未損』者，中於文章、學問、碑版三者之福，所享已多，天道忌盈，人貴知足，故於科名、仕宦，泊然無營，誠自知稟受有分爾。」而趙魏也說：「所得之本，較吾家松雪翁為尤，最宜其泊然無營」，如此一來，汪、趙二人可謂之「同心」了。可見，趙魏跋文所言和汪中所轉述的趙魏所論「右軍雖變隸書，不應古法盡亡」一說全然相反，從文本本身來看趙魏似乎是放棄了自己以往對《蘭亭序》的「偏見」而轉向認同汪中「《蘭亭》出右軍」之論，難怪李文田在見到汪中跋文和趙魏跋文之後要「助趙文學之論」了。

那麼趙魏是不是真的改變了自己質疑《蘭亭》的態度了呢？如果僅從字面意義上看，似是如此，但實際的情況卻並非如此。趙魏作為汪中舊友和汪喜孫的長輩，在汪喜孫請其題跋時，當然不會直寫胸襟！在以儒家道德為終極關懷特別是清代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背景下，汪喜孫請趙魏為其父舊藏且極為推崇的《定武蘭亭》作跋實際是「孝」的一種表現，假設此時趙氏「直寫胸襟」，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可是對於質疑《蘭亭序》的郭沫若而言，趙魏的這段跋文顯然是與自己「質疑」《蘭亭序》的意見相衝突。換言之，假設郭沫若在引「李文田跋文」質疑《蘭亭序》的同時，又引證趙魏這段肯定「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題跋，當會直接會造成其理論本身的自相矛盾：既然趙魏是李文田質疑《蘭亭序》的「先驅」，怎麼又會去肯定《蘭亭序》呢？因此為避免這樣的「矛盾」出現，郭沫若極有可能在此問題上有意「隱瞞」了真相，而作為最早和郭沫若展開論辯的高二適，顯然是不知道有「趙跋」，因此在他的〈《蘭亭序》真偽駁議〉一文中，不僅

⁸¹ 水賚佑：《〈蘭亭序〉研究史料集》，頁491。

沒有提及「趙跋」對汪中和「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肯定，而且在論及趙魏時，也只是引了「修禊敘跋尾」中所轉述的趙氏觀點。在此後數十年間的「蘭亭論辨」中，也幾乎無人對此問題問津，自然也無法予以澄清。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不禁要問：「趙魏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既然如此重要，為何會無人關注呢？這就是與人們先前對「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予以足夠重視以及學科的分化有關：一方面，趙魏的跋文雖然題寫在「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中而不為世人所熟知，但是汪喜孫在編撰《容甫先生年譜》時，便將「趙跋」加以潤色後收錄其中，雖然文字上略有改動，但趙魏肯定汪中和「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部分得到了保留，所以只要對「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予以足夠重視，沿著「汪中」這條線索便不難在年譜中看到趙魏的這段跋文；⁸² 而另一方面，由於學科越來越走向精細化、專門化，造成了熟悉「蘭亭論辨」的學者不甚了解汪中及其相關史料和思想，而熟悉汪中乃至整個揚州學派的學者們又對「蘭亭論辨」知之甚少，所以長期以來，人們對於趙魏題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一事始終處於有待研究和挖掘的狀態。

綜合以上三點的討論不難看到，郭沫若在「蘭亭論辨」當中雖然言之鑿鑿，但其實卻存在著不少有意或無意的錯誤，僅與「汪中舊藏《定武蘭亭》」有關的，便有上述三處。雖然這三點與「蘭亭論辨」的核心問題——《蘭亭序》的真偽問題——關係不大，但是卻通過這個問題可以看到，郭沫若在撰寫質疑《蘭亭序》的文章時，其實已經有

⁸² 《容甫先生年譜》引「趙魏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嘉慶十八年春，餘遊邗江，重過問禮堂，孟慈盡出所藏周玉虎符、陳氏簋、射陽畫像，摩抄響拓，竟日劇話，故友容甫所遺也。容甫文字之餘，即握管作書。楷法歐陽，行法《聖教》，晚年醉心《蘭亭》，日臨一過。讀其所跋數千言，論《定武》實出右軍，為桑氏《博議》中所未經見，洵具千百年眼者。所得之本，較吾家松雪翁為尤，最宜其泊然無營，知足之樂，余二人有同心耶？」參見汪喜孫：《容甫先生年譜》，收於汪中著，田漢雲點校：《新編汪中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頁29。

了一個「先行」的判斷：《蘭亭序》是後人偽託的。因此無論在他引用文獻，或是在其行文過程，其核心問題是要證明《蘭亭序》並非王羲之原作，至於「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和「李文田跋文」的出現，卻正好為其立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因此他才會在對版本未加詳細考辨的情況下便斷言李文田題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為端方所收藏，才會在有意無意之間「隱瞞」了他得到「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真正來源以及「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當中趙魏題跋的存在。看到了這一點，甚至還可以進一步推測：假設郭沫若沒有在羅培元那裡見到「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他依然是有可能寫出一篇或一系列質疑《蘭亭序》真偽問題的文章，而「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亦不過是「蘭亭論辨」產生的一個「引子」和「導火索」罷了。

（三）「蘭亭論辨」：新、舊「觀念」之辯

通過上文的討論可知，「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為「蘭亭論辨」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並通過對相關史料的梳理和研究，發現了郭沫若對於「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三處「誤讀」。但是僅僅如此，尚不足以體現「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對於研究「蘭亭論辨」而言最為重要的研究價值，那就是：「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可以看作研究「蘭亭論辨」的一個重要的參照系，其帖內諸跋語及外衍史料所構成的對於《蘭亭序》真偽、優劣的討論恰恰可以作為一個研究視角來理解和研究「蘭亭論辨」，而「蘭亭論辨」的實質也便能由此突顯出來——不過是一定歷史條件下「觀念變遷」對於人的思想、行為和行動的塑造。這也就是說，「蘭亭論辨」雖然討論的問題關乎《蘭亭序》的真偽問題，但其實只是特定時代觀念作用的結果，具體而言。即堅持傳統說法認同《蘭亭序》出於王羲之原作的「觀念」與本著「科學」和「革命」的態度認為應對傳統說法加以揚棄的「觀念」之間的論辨，而與《蘭亭序》的真偽問題並不真正相關。

1. 「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研究「蘭亭論辨」的「參照系」

通過對「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及其相關史料的梳理得知，在汪中「修禊敘跋尾」承接宋元以來對「定武本」《蘭亭序》的推崇態度而提出對《蘭亭序》的贊譽之後，引起了李文田的質疑和反對，而且李文田不僅否定汪中的這件「定武本」《蘭亭序》，而且以《臨河序》為依據從文本的角度徹底否定了《蘭亭序》的真實性。在前文的討論中已就此問題做出了詳細的討論，在此不再贅言，但是需要強調的是：「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中「修禊敘跋尾」、「李文田跋文」所包含著自宋元以來直到清代晚期人們對於《蘭亭序》的認識態度及觀念變化，恰好為今天從整體上把握「蘭亭論辨」提供了研究的視角，即「《蘭亭序》本身的真偽」與「人們是否認同《蘭亭序》」這兩個問題並不處於同一個層面上，而在研究過程中，又必須將這兩個問題「剝離」之後，才會看到「蘭亭論辨」從根本上而言是一場新、舊「觀念」之間的「鬥爭」。在「蘭亭論辨」中，郭、高二人分別代表著當時人們對於《蘭亭序》主張揚棄傳統觀念和繼承傳統觀念的不同態度，而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後的今天，當學人們要討論《蘭亭序》的真偽問題時，「蘭亭論辨」本身又成為了一個不容跨越的時代觀念背景。這一觀點，正是筆者在對「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相關史料和問題進行梳理和研究的過程中逐漸明晰起來的。

以「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作為「參照系」，從思想觀念變遷的角度來理解和研究「蘭亭論辨」，是今天「跳脫」出「蘭亭論辨」困境的一個重要突破口。「蘭亭論辨」討論了數十年，非但沒有對《蘭亭序》的真偽問題有所確定，反而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而越來越複雜，以至於今天有許多人雖然長期學習、取法《蘭亭序》，但他們大多數人不願意涉足《蘭亭序》的研究，因為一旦進入這一領域的研究，「蘭亭論辨」和《蘭亭序》的真偽問題便是不得不「啃」的「硬骨頭」。「蘭亭論辨」在近乎「無解」的情況下，今天的學界不得不對之「寧信其有」或「避而不談」，而無法從「蘭亭論辨」的「沼澤」中走出來，以

「退而瞻遠」的方式將「蘭亭論辨」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現象來加以考察，這是一件多麼令人遺憾的事情！而以「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中汪、李二人題跋的相關來看郭沫若與高二適之間的論辨，不正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運用新的史料和新的觀點對傳統話題的「再詮釋」嗎？

由是可知，「蘭亭論辨」並非「無解」，《蘭亭序》也並非無法研究，只是人們需要看到「蘭亭論辨」的核心問題雖然是《蘭亭序》的真偽之辨，但其實只是在對「凌駕」於「《蘭亭序》真偽」這一學術問題之上的關於《蘭亭序》的認知態度和接受觀念的辯論而已，而非真正觸及「《蘭亭序》真偽」這一核心問題，而要發現並解答這一現象，「汪中舊藏《定武蘭亭》」便是一個重要的「支點」和突破口。

2. 「蘭亭論辨」的起因

「蘭亭論辨」發生之初，人們對於這場突如其來的論辨感到非常奇怪，不理解為什麼郭沫若會突然發動這場以「《蘭亭序》真偽問題」為核心的「大討論」。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史料的不斷披露，大家發現當年這場「蘭亭論辨」遠沒有人們所了解的只是郭沫若、高二適之間的一場學術辯論那麼簡單：學界有人認為郭沫若撰寫質疑《蘭亭序》的文章源自康生和陳伯達的授意，而有人又進一步發現康、陳之所以要批判《蘭亭序》，是針對著劉少奇（1898-1969）關於《蘭亭序》的一次正面評價，也有人提出康生（1898-1975）在授意之前並未想到會出現高二適的「駁議」，也未想到會發生隨後的「蘭亭論辨」；一種說法認為「蘭亭論辨」的出現與毛澤東的支持和關心有關；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可能與康生和容庚（1894-1983）之間的一次關於《蘭亭序》的討論有關。上述這些觀點雖然對某些史料和歷史中的細節進行了梳理和挖掘，但依然難以在整體上理解「蘭亭論辨」產生的原因，因為很難想像如「蘭亭論辨」這般如此深入而浩大的「論辨」會是某個個人在背後一手推動的。故此，想要回答「蘭亭論辨」如何產生這一問題，還是要回到那個時代，從其時代背景的深層結構中去尋找答案。

《蘭亭序》作為王羲之最為經典的書法名篇，這在唐代以來為世人所共識，對於《蘭亭序》與王羲之之間關係的否定，其實無異於否定孔子與《論語》之間、屈原與《離騷》之間的關係一樣。那麼到底是在怎樣的情況之下，郭沫若才會產生對《蘭亭序》真偽的質疑呢？新中國成立之後，黨中央在「百業待興」的情況下確立了對科學界和文化藝術界的兩個最重要的工作方針，一是主張歷史上任何階級社會所發生的科學與文化藝術都帶有階級性和歷史的局限性，而新中國發展科學和文化藝術的目的是要「為人民服務」；同時還主張科學與文化藝術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不能通過政治手段強加干預，而是要發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工作作風，鼓勵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方法指導下，通過辯論的方式來解答未解的疑問，即「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⁸³這也是正是後來在「蘭亭論辨」過程中，毛澤東提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並支持「論辨」的思想來源。

按照當時流行的「階級鬥爭」分析方法，《蘭亭序》作為東晉士大夫階層最為重要的大家族之一——王氏家族——的典型人物王羲之的書法代表作，那麼在思想上必然地反映著王羲之以及東晉門閥家族的思想觀念，他們身處「統治階級」，其思想自然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同時在《蘭亭序》中有很多「悲觀」的思想，這些悲觀思想屬於封建思想的「遺毒」。由上述兩點可知，在「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背景下，王羲之和《蘭亭序》理應受到「歷史和人民的審判」，可有趣的是，郭沫若在文章中並沒有如此論證。

在郭沫若看來，《蘭亭序》既不是王羲之所寫，也不是王羲之所做，思想和書法都與東晉時代差距很大，所以不能將《蘭亭序》直接與王羲之聯繫起來。特別是「夫人之相與」以下的悲觀思想，郭氏直

⁸³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收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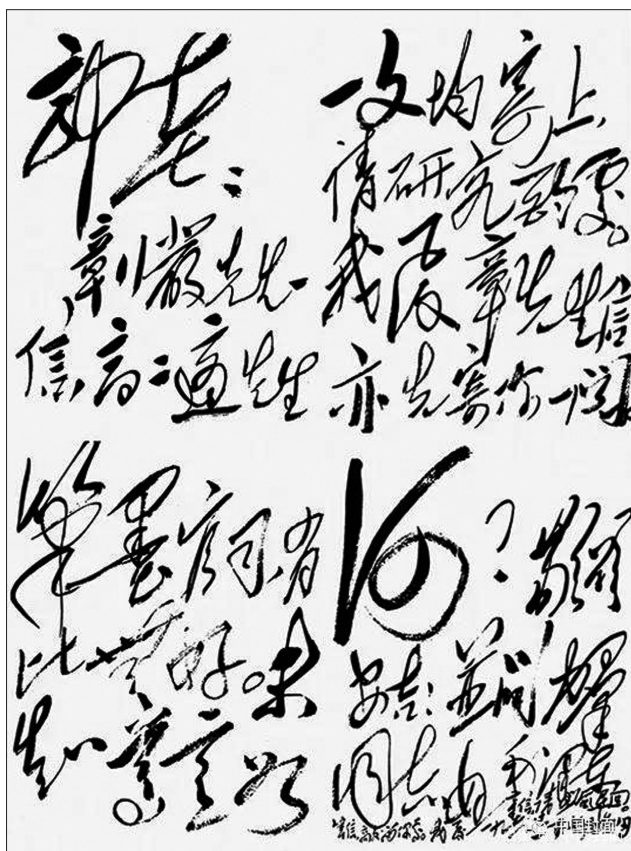


圖 17：毛澤東致郭沫若書信⁸⁴

指是有人依託，而且認為這個「偽託的人」「是不懂得老莊思想和晉人思想的人，甚至連王羲之的思想也不曾弄通」；⁸⁵再者，郭沫若對於王羲之的評價頗為正面，說王羲之「骨鯁」、「有裁鑒」、「有為逸民之懷而又富於真實感懷」的人，還「頗能關心民生疾苦、朝政得失、

⁸⁴ 毛澤東致郭沫若書信，提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編：《中國最具代表性書法作品·毛澤東作品》（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13年），頁68-71。

⁸⁵ 郭沫若：《〈蘭亭序〉與老莊思想》，《文物》1965年第9期，頁10。

國勢隆替」，這樣的人怎麼會說出如此「悲觀」的話呢？所以傳世的《蘭亭序》「不是王羲之的文字是斷然可以肯定的」。⁸⁶ 這樣一來，郭沫若的觀點似乎並沒有將王羲之和《蘭亭序》徹底否定掉，只是將他們二者之間的關係給剝離，並予以王羲之相當程度上的肯定。難道說「蘭亭論辨」真的如有些學者所說，只是一場學術辯論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任何學術的辯論都無法脫開政治因素的影響，而如「《蘭亭序》真偽」這類觸及到中國文化大傳統以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大問題，更不可能只是一場純粹的「學術辯論」。在1965至1972年間，郭沫若撰寫並發表了多篇質疑《蘭亭序》的文章，將這些文章作為整體來研讀的話，就會發現郭沫若質疑《蘭亭序》的文章寫得非常「巧妙」：他一方面質疑《蘭亭序》為偽作，另一方面又肯定《蘭亭序》的書法，還反復強調《蘭亭序》之所以被後人所推崇，就是因為從唐開元、天寶年間開始，《蘭亭序》的種種傳說有如「神話」一般，而他寫作的目的，正是要破除這樣的「神話」而還其本來的面目。在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併發生意識形態重大變化的20世紀50至60年代，「一切人類優秀的文化都要批判地繼承」是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給予文化藝術界的總的任務，因此，不能看到郭沫若的文章中對於王羲之和《蘭亭序》書法持有肯定態度，便片面地認為郭沫若發動「蘭亭論辨」只是在討論「《蘭亭序》真偽」這樣一個「學術問題」；從更深層次上講，其實是由社會變革和觀念變遷所造成的。換言之，在那樣一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就算沒有郭沫若撰寫質疑《蘭亭序》，也會有其他人在某種場合或條件下質疑之，而熟悉那段歷史的人們都知道，當時除了「蘭亭論辨」之外，其實傳統文化普遍受到著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無論在藝術界、文學界、哲學界或史學界，這樣類似的爭論和質疑層出不窮，「蘭亭論辨」也只是當時諸多「論辨」中的一環而已，只是

⁸⁶ 郭沫若：《〈蘭亭序〉與老莊思想》，頁10。

因為《蘭亭序》真偽的問題所涉及的問題更為複雜，才未能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四十年間予以準確定位和回答。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學界一直以來所期待著能夠通過出土文物的出現才得以解決的「蘭亭論辨」，在將其納入到思想史的研究視角之後，亦發現了許多之前人們未能涉及或尚未留意的問題和史料，並由此能夠對之進行重新的理解和定位。在此意義上而言，新的史料固然重要，而研究的方式和視角亦應當所有創新，這樣才能夠不為前人所惑、不為枝微末節所惑。

（責任校對：洪國恩）

徵引書目

- 《蕭翼賺蘭亭圖》，見吳炎亮主編：《又見大唐》，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2019年，頁203-224。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編：《中國最具代表性書法作品·毛澤東作品》，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13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 文物出版社編：《蘭亭論辨》，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
- 方波：《宋元明時期「崇王」觀念研究》，海口：南方出版社，2009年。
- 方波：《詮釋與重塑——基於社會文化學的王羲之及其書法接受史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6年。
- 毛天玕：〈《蘭亭序》世紀大論辨〉，《檔案春秋》2005年第12期，頁9-14。
- 水賚佑：《《蘭亭序》研究史料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3年。
- 王明清：《揮麈後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
- 王雲五主編：《書譜 續書譜 法書通釋 春雨雜述》，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 王禕著，顏慶餘點校：《王禕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
- 王羲之著，吳讓之題記：《開皇本蘭亭序》，上海：有正書局，1917年印本。
- 白銳：《唐宋《蘭亭序》接受問題研究》，海口：南方出版社，2009年。
- 米芾：《寶章待訪錄（外五種）》，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年。
- 朱熹：《大學章句集注》，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舊藏宋

淳祐十二年當塗郡齋刻本。

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李之儀：《姑溪題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李保華：〈關於汪中校書精法樓的三篇佚失碑記拓片及說明〉，收於趙昌智主編：《揚州文化研究論叢》第11輯，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頁1-11。

李驚哲：《李文田與「清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

汪中著，田漢雲點校：《新編汪中集》，揚州：廣陵書局，2005年。

汪中舊藏：《真定武蘭亭序》，上海：文明書局，1924年。

邢照華：〈郭沫若致「蘭亭富翁」羅培元的一封信解讀〉，《檔案與建設》2010年第6期，頁37-38。

周密：《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祁小春：〈關於「李文田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蹤跡及其相關問題〉，《美術觀察》2017年第2期，頁26-27。

祁小春：《山陰道上——王羲之書跡研究叢筭（增補修訂版）》，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7年。

抱殘守缺生：〈現存《蘭亭序》的主要刻本〉，《書苑》第2卷第4期，東京：三省堂，1938年，頁32-51。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

故宮博物院編：《王羲之王獻之書法全集》，北京：故宮博物院，2015年。

孫承澤、高士奇：《庚子銷夏記 江村銷夏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桑世昌、俞松：《蘭亭考 蘭亭續考》，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年。

- 高二適：〈《蘭亭序》的真偽駁議〉，《文物》1965年第7期，附錄，頁1-13。
-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年。
- 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第十二冊），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3年。
- 黃庭堅撰，白石點校：《山谷題跋》，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
- 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
- 郭沫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文物》1965年第6期，頁1-25。
- 郭沫若：〈從王謝墓誌的出土談《蘭亭序》的真偽〉，收於文物出版社編：《蘭亭論辨》，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頁5-32。
- 郭沫若：〈《蘭亭序》與老莊思想〉，《文物》1965年第9期，頁9-11。
- 郭沫若臨《蘭亭序》，見車永仁編：《蘭亭序書畫雅集：古今名家墨跡》，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頁47-49。
- 陳一梅：《宋人關於《蘭亭序》的收藏與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1年。
- 陳忠康：《經典的複製與傳播——以《蘭亭序》版本為中心的考察》，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
- 傅紅展、趙國英、馮建榮主編：《蘭亭書法全集·故宮卷》第2冊、第3冊，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年。
- 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
- 董其昌著，邵海清點校：《容臺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
- 趙希鵠：《洞天清錄》，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
- 趙孟頫跋「落水本」《蘭亭序》，清內府摹本。見啟功編著：《堅淨居叢帖·珍藏輯 清乾隆內府摹刻落水蘭亭並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9-31。
- 趙孟頫著，錢偉強、顧大朋點校：《松雪齋題跋》，杭州：浙江人民美

術出版社，2017年。

樓鑰：《攻媿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

歐陽脩：《集古錄跋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劉餗等：《隋唐嘉話 大唐新語》，北京：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韓珠船舊藏：《唐拓定武蘭亭序》，上海：文明書局，1941年。

羅培元：〈登高行遠我負其導——從郭沫若同志遊、學之雜憶〉，收於郭沫若故居、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編：《郭沫若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頁98-118。

羅培元：《無愧的選擇——羅培元回憶錄》，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

「天曆本」《蘭亭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蘭亭八柱第一」。北京：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網址：<https://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10/3747/img0003.xml>，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臨本」《蘭亭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蘭亭八柱第二」。北京：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網址：<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s?id=71058>，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宋米芾題《蘭亭序》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網址：<https://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10/3749/img0002.xml>，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定武「柯九思」本《蘭亭序》（《定武蘭亭真本》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典藏資料檢索系統，網址：<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Painting/Content?pid=14853&Dept=P>，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定武「獨孤僧」本《蘭亭序》，東京：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網址：<https://webarchives.tnm.jp/imgsearch/show/C0066716>，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陶北溟舊藏趙孟頫跋《蘭亭序》，北京：雅昌藝術網，網址：<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71450739>，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趙孟頫跋「獨孤僧本」《蘭亭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網址：<https://webarchives.tnm.jp/imgsearch/show/C0066722>，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趙孟頫臨《蘭亭序》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網址：<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s?id=70961>，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